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宗教科

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关于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会”的情况反映

自1959年8月18日起至1959年9月9日止

本卷内共95张

保管期限：定期

移交案卷目录中的顺序号：49

1959年8月17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一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吴耀宗于三、四天前与李储文谈苏美问题，吴说：“最近应该把参考消息里各方面对于苏美首脑互相访问消息与以注意，我注意后，觉得确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胜利，但美国方面也有企图要使赫鲁晓夫知道美国力量，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用过去搞颠覆方式进行冷战，另一方面，也用公开方式显示力量来进行冷战。”

“国内克服右倾情绪，每年如此，前半年觉得‘还有时间’，就比较松，下半年就要抓，去年也是八月抓，现在再不抓紧，第四季度就要受影响。”

吴耀宗对尹襄说他儿子从福建回来说那边副食品非常困难，火车站上也没有人背行李，还有人特别托人到上海买肥皂，其说时直摇头觉得太苦了。

陈中浩（武汉三自积极分子）找吴耀宗谈话，吴没谈关于座谈会问题，只问了陈关于武汉的几个问题：（一）武汉教会整个安排情况——劳动情况；退休是否终身补贴；礼拜堂还有几只；教友人数还有多少。（二）右派情况——张海松（圣公会主教，右派）情况如何；觉得黄福林（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是右派很奇怪。（三）武汉副食品问题。（四）问湖南教会情况（按：吴对湖南不来报告有意见，原想要陈中浩前去了解，后因积极分子指出可能不妥而未去）。

上海三自几个负责人员酝酿汇报上海三自工作与存在问题时说：谢永钦提出（谢对小型座谈会情绪很高）：礼拜堂既派了别的用场，就应该把堂名与十字架拿下来，我每次看见永志堂就觉得脑袋发痛（按：永志堂是谢的教堂，现已充别用），觉得礼拜堂做了别的用处。

现在觉得灵修方面空虚，神学院到底如何办，听说没有学生，教会将来前途如何？

是否每个传道人都要做工人（意参加劳动生产）。

退休补贴是否补助终身，区里没有讲明。

戚庆才提出：

（一）各区经济，现在虽然都还有几万存款，这都是卖东西卖出来的，用完以后怎么办？

（二）留在教会中的人讲道没有时间准备，平日开会等等，如何做到自食其力？

（三）联合礼拜后有人不来教会，这些人不一定是落后，很多是里弄积极分子，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办？现在（指联合以后）人数是多，但原来决不止此数。

（四）信仰互相尊重，有否期限，究竟不是团结最好方式，唱诗与宗教仪式都是与信仰有关，如何彼此尊重？

（五）联合礼拜最后目标到底是什么？

（六）信徒在问参加生产的牧师，是否还会回来，这些是否还称他们为牧师，还是称他们为同志？

（七）各教会外表联合，事实上还有小圈圈。

孙彥理提出：

（一）信徒在问，到底联合礼拜是否政府强迫，是否政府消灭宗教过程的一步？

（二）联合礼拜与宗派有什么关系，卫理公会要找我（孙是卫理公会上海教区长），我解决不了问题，要留宗派名义是否只是为了国际影响？

（三）教牧人员太忙，一点时间也没有。

（四）青年工作搞不起来，教会前途有问题。

左弗如提出：

信徒有的爱联合礼拜就像过去爱“聚会处”一样，但也有信徒说：“三自骗人，我们过去从公会出来，现在又回到公会”。

8月14日陈见真与郑建业谈话（关于小型座谈会）：有些问题有些信徒是没有通的，比如颜老（指颜福庆）在北京和吴谈，他觉得“你们把教会这样搞，是把教会的前途搞掉了，今后教会到底怎样呢？我也和他谈过，但没有解决，我想这是个问题，今后到底还是有个总的全国教会的机构呢？还是各地就成了地方教会？当然各宗派还自己维持体系是不行的了，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整个的中国基督教教会的体制呢？如果各地都是地方教会，这也确定一下，老实说，从政府讲，他倒不见得不要各地教会就成为各自独自的地方教会，佛教就是这样。

可是这还有些问题，如果今后各地都是地方教会，牧师一旦没有了当地没有继任的人，怎么调遣呢？是否可以制定一定的办法，还是全国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还是各地随便搞？

至于神学问题（吴耀宗曾在会上提出有八个关于神学问题可以谈谈），我看很难说，这也要现实，我看今后教会，还是仪式多一点好，少讲讲道，那些每个礼拜都要讲那么多道的教会，我看他们将越来越困难，你讲些什么呢？……苏联到现在还有东正教，他们就是这样，仪式重，但不讲什么道，共产党是唯物的，老实说他们不会赞成宗教，你要信的就去行仪式，但没有多少道理好讲这个要现实。……

要紧的是要听听各地的汇报，各地到底是怎样搞的。这次来的人，从表现积极来说，都是有贡献的，但对于教会的全面情况是否透彻了解就不知道了（郑在国际形势问题上几次试探，陈总是转开话题不愿谈）。

广州积极分子孙务纯反映，熊真沛（广东省三自主席）十分注意这次出席人员名单报到“崔宪祥没来开会，怕有问题”，“似乎戚庆才也没有来（实际上戚来开会的），这样，这变化是很大了”。

熊真沛听到李储文说“这次座谈会是谈倦了休息，休息完再谈”，熊回房间对孙务纯说“这样的会是慰劳我们了”。

熊真沛对李寿葆、施如璋说“广州教牧人员情绪不很好，主要对政府有怀疑，有人认为礼拜联合，教牧劳动，没有人好好管教会，信徒就都不来了，教会就跨了”。

又说：“教会现在人数比过去少了（指广州）一方面是信徒忙了，但另一面教牧不好好搞教会工作，信徒也不愿来了”。

熊很强调教牧太忙，觉得劳动安排不够好，太紧。

1959年8月18日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函

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最近在上海召开一个四十余人的宗教界代表人物座谈会，主要内容：有国内外形势及宗教问题等，特将会议情况反映送你一份，供参考。

1959年8月19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二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小型座谈会今日除上海21人外，由各地来的有：

南京：吴贻芳、丁玉璋、韩文藻

杭州：蔡文浩、钮志芳

北京：蒋翼振、赵复三

西安：王道生

天津：刘清芬

广西：沈明燧

厦门：郑锡爵

武汉：陈中浩、陈建勋

广州：熊真沛、谭沃心、孙务纯

南昌：许世琦

河南：曾友三

武汉陈建勋因船误期今晚（17日）才到，未出席今日座谈，四川方面仍未有消息。

上午举行全体座谈会，吴耀宗讲话，指出会议为了交流经验汇报情况，鼓励大家要提出问题，指出：“问题并不可怕，暴露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工作往前发展”。此外并着重提出“1960年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十周（年）纪念，明年要召开全国基督教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要总结三自十周年来所取得的很大成就，而且要决定三自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应做些什么，肯定方针任务。”

接着大家发言，一般上层都强调这会开得非常及时非常需要，因为最近教会“伤了风”（意指大家不通气），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很多人表示愿意提出问题，广西沈明燧则强调“应该肯定成绩，说问题与缺点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

下午各地方分别酝酿汇报内容与要提出问题，上海21人在一起酝酿谢永钦的提纲。

上层在会议中相互接触很频繁，吴耀宗、谭沃心在大家去看电影时进行深谈；陈见真找南昌许士琦谈话；谭沃心找蔡文浩了解中华基督教会情况；熊真沛找吴耀宗谈话；谢永钦找丁玉璋谈话；吴贻芳、谭沃心、熊真沛等不少人都很注意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总干事，未戴帽右派）没有来开会，但都不愿正面提出来问，用旁敲侧击办法来试探情况。

吴耀宗：

一、与丁光训谈话说：“北京神学院条件很好，可以设为神学院分院（按：‘分院’意思，吴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留有余地。”还对丁说希望神学院明年春天可以开学。

丁说到神学方面以后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吴说：“研究神学只要不和社会主义抵触，但也不牺牲基督教信仰特点”。

吴希望中国基督教方面有人来写篇文章评论捷克赫鲁玛德卡教授的文章（按：赫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基督教和平运动文章）。

吴对丁推崇美国基督教世纪报上登载的巴德的文章（按：巴德是西方著名神学家，近著一文答复民主德国牧师，鼓吹以宗教特点长期对付共产主义，但也稍事批评资本主义）不同意丁说这文章是“中立主义”，说也不是“各打五十板”。

二、吴对李储文说：“今天会轻松空气形成，但是各地对此会要求很高，真的会后没有结论，大家要失望，有必要某些点上要得出结论。”还说：“大家说的还是些细小问题，像赞美诗等，这些问题要说，但若不从关键性问题，不从大的，历史眼光，不从国内外形势来说问题就说不好”，说时表示不满。

吴告李，吴高丹（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东亚干事，缅甸人）又来信还把他们定言稿寄给他看，吴说：“好像很不系统”。说吴高丹已接受苏联尼古拉大主教邀请将访问苏联，还要访问后在中国作过境访问，吴说：“不能不理他吧”。

吴贻芳：（对丁光训说）“我是冒失……讲了二句冒失话，第一说汇报各地经验只说重要经验，不必什么都说；第二，问今后应该如何打算（按：吴在16日晚会务会的讨论会议开法时，提出要突出重点汇报，并强调要总结经验，……与改正思想提问题精神不符，故未附和，吴已感觉）。其实我们在杭州还在说，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宗教今后方针也应由宗教事务局来决定。当然我们也当提出我们的意见，我想关于今后如何办，最好在此次会议同少数人一同研究一翻。”

“宗教前途掌握在上帝手中（按：丁说解放后未听见吴提过‘上帝’，但我们人也有责任作些打算，如果没有人信了，那是另一回事，何（成湘）局长告诉我，今天苏联还有新进教的人，\*\*\*（南京三自秘书长）南京也还有新的信徒”。

陈见真：一贯讲话不着边际，始终在试探想摸底，一直试图避开正面提问题（有人提他代表提出关于全国性机构问题的意见，\*扬言说，提各机构问题是走回头路，现在已联合，不应再提各宗派情况）。

涂羽卿、江文汉：在上海方面酝酿关于全国性机构时（指教会各宗派上层机构及全国性团体机关）都暴露情绪。江说：“全国机构没什么可报告的，都是泄气的事”。涂羽卿说：“全国机构问题不必特别汇报情况，要提问题，只有一句话，大家共同的，就是：‘全国性机构还要不要存在？如果要存在，那么做些什么？’”

有人害怕说错话：

缪秋笙（联合书局副总干事）说：“上海不应该把浙江平阳等地方没有礼拜堂事放在汇报内，这是上海扩张主义，如浙江方面觉得有问题，他自己会提，他如不提，那一定就没有问题”。

左弗如在上海第一次酝酿会上说“聚会处信徒认为三自骗人……”今天又再三声明，信徒可能有这样思想，但从来没有说过“骗人”字眼，至少我没有听过。

丁玉璋对韩文藻说：“谢永钦对我说，1954年三自说不做太上教会，现在又如何办？我试试说服他，我对他说，54年三自是不要做太上教会，但现在形势变了，形势逼人，三自不管谁去管？”（丁玉璋在会内一贯四平八稳）

许士琦对沈德溶说：“南昌有一个教会，一个月做一次礼拜，没有奉献。大家生产情绪不高。”

郑锡爵对李寿葆说：“厦门进行联合以后，最近有些人（王宗诚等）想走老路，说‘福州是省会都不联，我们也不联’，大家对劳动顾虑极大，因为没有明确劳动目的，是锻炼还是生产，是短期还是长期，怕转业出去，对劳动工资问题 ，顾虑很大。”

郑对厦门教会情况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一些思想问题，肃反、反右后没有什么问题了”。郑还说：大家都关心神学院问题。

1959年8月19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三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日（18日）上午北京、上海两处汇报情况，北京由蒋翼振谈一般情况，赵复三谈存在问题，上海由谢永钦谈教会情况及存在问题，江文汉谈全国性机构及团体一般情况。

下午浙江钮志芳、福建郑锡爵、开封曾友三汇报。汇报内容一般比较平淡，谢永钦谈时非常谨慎，还不及在会前在上海三自酝酿时那样敞开。江文汉只谈具体情况，除了表示各机构“无公可办”的暗淡气氛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与问题，蒋翼振谈得一般，显然还没有使这些上层敞开思想。

郑锡爵谈福建情况，对福州情况只一句带过，谈厦门情况时给人印象教会“集中合并”只是为了解决使用房屋问题，其他均未变动，谈话中数次突出打出王宗诚（虽未指名）显然与王有个人矛盾。

曾友三谈开封情况，关于开封宗教界办工厂制造耐火材料取得重大成就一段，给人印象非常突出，但谈到教会合并宗派，取消许多宗教仪式（如施洗、圣餐、奉献等）因尚未有妥当办法一律“暂停”时，大家哄堂大笑。吴耀宗、谭沃心脸色非常难看，陈见真显出苦笑。谢永钦对生产一段听得非常有味。

对汇报内容反应：

吴耀宗对施如璋说：“曾友三谈生产很有兴趣，谈教会工作时也不那样躲躲闪闪想遮盖，没有就说没有，倒是有劳动人民朴素之风，是怎样就怎样说。

“郑锡爵身为省三自秘书长，如何对福州只说一句，完全是对工作不负责，路过福州，应该去了解一下，张光旭是福建三自主席也应该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即使不是主席，以他这样年长与教会地位，也应该去和他谈谈”（言下对郑非常不满）。

又说：“谢永钦没有把话说出来，他在北京（大概指1957年在北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对我说的东西我还有记录可查，但他都没讲。”

吴贻芳对陈中洁说厦门“等于没有动”，对开封一些宗教活动，吴说这是“因噎废食，消极”。

丁玉璋说：“厦门的情况大家都不满意，显然大家觉得这样做法不对。”

丁光训问涂羽卿究竟为什么道理全国性机构还没有取消掉，涂谈了三个理由：（一）由于国际影响；（二）这些机构中负责的都是有声望的人；（三）有些信徒，尤其年老信徒，像颜福庆，对宗派感情都很深，如果听到宗派取消，会引起很大的不满。

晚间开会务会议（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长会议）讨论汇报情况与下一步聚：

吴耀宗说：“所提问题，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以后就根据这些讨论：一、由宗派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二、是由劳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三、事业问题，如神学院、出版事业等。（按：吴很想从‘宗派’入手讨论，可以从宗教立场出发，保护教会的利益，并可发挥他的宗教上的一套东西。他认为‘劳动’是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如宗教生活与生产安排的矛盾等，暴露吴对教牧人员参加劳动的不满）。”

陈见真不同意由宗派入手讨论，说会说不清楚，主要应该谈联合礼拜，为什么联合？今天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对为什么要联合的动机没有弄清楚，弄清楚后就不会走回头路，会往前走（按：陈常说保留宗派是走回头路）。

陈又补充说：“今天听了汇报，我又有新的看法，即使将来可能成立全国性的新体系，但是目前要还必须是地方性的教会局面，而且这种局面，至少要搞二、三年”（按：陈对丁光训说：“全国性机构现仍保持的原因，是因为新的体系尚未成立”，陈主张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丁玉璋也不赞成从宗派谈起，他说：“从宗派谈起，谈二、三年也谈不完，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领导’，目前势必需要三自领导，但有的地方没有三自，怎么办？例如南京教会接受三自领导毫无问题，但像江阴传道人不肯再传道，那么谁去解决问题，没有明确三自可以管，那省三自也不好意思去管。这问题明确一下，那么名正言顺，三自就可负起责任去管了”。

吴贻芳开始时也强调中心问题是宗派问题，应该从宗派谈起，但她说：“宗派问题也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是帝国主义殖民问题，另一方面其中还有纯宗教的问题，涉及信仰问题，这问题很深刻，须要有人就准备一下作个发言再讨论。”但后来她听了陈见真的意见，她又同意陈的意见（吴贻芳最近谈话宗教气氛比过去深厚得多）。

吴高梓一直没有开口。

晚上电车上涂羽卿与程步云对李寿葆表示对开封搞工厂情况有意见，涂说：“他们这样搞，教牧人员不可能做教会工作了，工厂企业化了，领导上又那么重视，得服从生产计划，将业矛盾越来越大，教牧人员不会有时间去照顾宗教工作。还有，他们将来人身体也吃不消，那将来怎么能按照教会要求来办这个工厂呢？”

程步云说：“他们那办法不好，他们可以分一些人出来专门搞教会工作，其他的人认他们参加工作全部时间服从生产，这样会好些”。

陈见真对郑建业谈：

陈说：一、“这一天谈下来，我看这情形只好搞地方教会了，全国怎么大，你怎么统一法子？”

二、丁主教问我究竟为什么各宗教总机构还不取消，我想（一）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二）到底国际关系也有些要求；（三）我看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出什么新的办法来之前，就贸然取消旧的当然不好。”

三、曾主教私下告诉我，他们把教区五万元基金交作生产，投资的时候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的，那时曾说明，如果将来教区有需要，这笔钱还要收回的”。

1959年8月21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四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19日）上午天津刘清芬，江西许世琦，武汉陈建勋汇报；下午南京丁玉璋，西安王道生，广州熊真沛，广西沈明燧汇报。

许世琦说江西现在“一个月做一次礼拜，废除教会特点，废除奉献箱……，原因是因为影响家庭妨碍生产。每月其他三个礼拜教堂开门，但不做礼拜。”许多人追问他既然开门，而且也有人来，为什么不就做礼拜好？许说：“做了礼拜，那么他们（指信徒）就都要来了”，大家大笑。许被问时，态度很尴尬，支吾其词，好像有有口难言之状，谢永钦牧师对旁边人说：“索性就消灭算了”。

武汉陈建勋汇报不着边际，南京、西安汇报一般，广西汇报时表现信心很强，说制酱菜与收集历史资料情况时，大家很感兴趣。

天津汇报时刘清芬报到“天津将来教会逐渐没有了，就要坐火车去北京做礼拜了”。谢永钦在旁边低声说笑话：“还是都到莫斯科去做礼拜吧”。

广州熊真沛汇报时强调香港影响与教牧人员对劳动有抵触情绪。

两日来，看出上层对各地汇报情况兴趣甚大，显然吴耀宗要求召开这样会议确是符合这些上层的意图的。

会中“驰”的空气已有一些，初步形成“敞”的局面（大家在会外谈话比在会内发言要敞一些），但仍须深入，汇报情况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大跃进的冲击，教会阵地缩小，突出反映在“教会联合”与“合并”问题上，以及教牧人员参加劳动生产问题上。

上层中除沈明燧等（新的较小上层）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前面有路可走外，其他上层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吴耀宗、吴贻芳、陈见真等为代表，对这会有所企图想从中捞些政治资本，但具体情况又不一，吴更热衷于多挑些问题与意见（最希望有大是大非意见）出来，将来好与我们讨价还价。

第二类：以谢永钦、丁玉璋等为代表，较多出于宗教感情成份，向往宗教活动方面尺度能放宽一些。

第三类：以陈建勋、王道生等为代表，随大势，会中表现觉得无所谓，认为这样的会解决不了问题。

会外情况反映：

一、广州熊真沛对郑建业说：“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教会各级组织的关系问题，广西下面各县都联合了，但都没有问过在广州的各公会省领导机构。圣公会华南教区同人也有顾虑，他们说不知道主教院有什么意见。”

“另外就是传道人自食其力的问题，自食其力究竟应如何解释？你知道广州离香港近，教牧人员很多人一弄不好就想到香港去。”

二、广州谭沃心在听了厦门郑锡爵的汇报后在休息时对李寿葆说：“厦门的联合只是联合礼拜的第一步，他说他们那里将来也要合并。”李问他广州怎样，谭说：“广州有一次讨论联合礼拜问题，有16个牧师赞成，20多人没有意见，还有40个牧师反对，他们有顾虑。”问什么顾虑？他说：“怕教会没有了，怕要调离教会作别的工作。”

三、广州谭沃心对孙务纯说：“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在乎它的社会功用，某个社会重视它，它的精神影响就大，不重视它，它的精神作用就小，但它本身应有较宝贵的本质和作用，才能存在发展，……同工料理教会工作，应有专业，有钻研，否则基督教是存在也不过系和尚般的打钟念经德具躯壳而已。……必须培养出专门的高级人才，有丰富智识和思想的专门研究及思考教会的作用，教会才有发展……今天对自食其力应如何理解，是否一定要同工都靠自己的劳动而不靠教会的薪津养活自己……当然我不是说同工不应参加劳动生产，劳动生产神圣的，好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安排，参加到什么程度？”

四、吴耀宗今天（19日）早晨到丁光训房间说：“昨天一正天的汇报大家没有把心里话讲出来……大是大非的问题说起来是解决了，可是真解决了吗？例如对党的领导究竟如何？还有社会主义问题，副食品紧张问题、民主自由问题……关于宗教政策，昨天只有谢永钦说了一句乡村教会该开门的话，……还有传教士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当把传教士一棍子打死，说他们人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还有宗教前途问题，很多人心里觉得面前的路愈走愈狭了……”。

五、涂羽卿在许世琦汇报江西情况后向丁光训表示：“要扭转这一情况谈何容易？一、二个人在江西有何办法？全国三自委员会也没有办法，只有兜大圈子才能纠正过来。”丁光训问，“是不是指得通过中央”。涂说：“是啊”！又说：“已经成了事实要扭转它，牵涉的方面就多了。”

六、上海毛克忠、缪秋笙在听了江西许士琦的汇报后表示：“这样看来，上海是‘落后’了。”

七、厦门郑锡爵对孙务纯说：“河南三自会在劳动生产上做得有成绩，这应肯定，但他们却没有留意教会中的合并工作，所以这还是我提的工作重点的问题，是以劳动生产为重呢，还是以反帝斗争为主？河南开封就完全以劳动生产为重，对联合问题就忽略了，例如开封在留堂的问题上，曾主教说碰巧留下圣公会的两堂，为什么会是‘碰巧’呢？这样别的宗派的信徒和同工当然有意见，有不满。因此，他们不能解决这问题，如应付局面，就只有什么都‘暂停进行’，事情可能就是如此，否则为什么要暂停呢？”

八、昨天夜里九时半，吴高梓、熊真沛和孙务纯闲谈，主题集中在教会体制问题，熊、吴意见如下：

熊真沛：“当前各宗派的旧体制诚然不适合客观实际，因此有两个可能做法，一是以三自爱国会作领导的领导，不止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宗教教务上的，这一点当然与过去三自运动揭櫫的目的有出入，但当前实际有些要求，故此存在立法手续上取得根据，如用什么会议通过决议之类，同时存在三自的组织机构上的扩大，就可把政治上与教务上的领导权建立起来。另一种做法则可仿效工商联等团体，工商界有业务组织即工商界联合会，但作为工商业者的政治组织则有民主建国会。基督教也可参考这种做法，即是把三自会依然保留为政治组织，另成立一教会联合机构来领导教会的宗教上的事情。”

吴高梓：“我看三自爱国机构依然是政治性组织，是领导政治思想，政治学习的，教的教务还得另立领导机构，但机构如何设立，则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且必须由下而上，决非由上而下。目前是个过渡阶段，有些东西三自会可以兼顾些的。”

九、在夜里与吴高梓谈话中，熊真沛对河南开封的做法的估价，有了一点与晚饭前表示不同，熊说：“开封教牧这样完全以劳动生产为主，礼拜天才回礼拜堂，结果必使教会与佛道教的庙堂差不多，成为信众朝拜诵经之所在，这样是个缺点。所以开封那样的劳动生产方式，做教牧同工而要料理教会，还是行不通的。”

1959年8月23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五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20日）上下午都是大组，归纳汇报中提出的问题，晚上分成三组再深入谈。第一小组是全国性上层人物，第二小组是上海成员，第三小组是外地成员。

上下午所谈的比前两天又敞开了一些，但鸣放得还不够，问题归的几方面，大家意见都差不多，不少人希望这次应谈会对这些问想能谈出头绪来。

一、联合礼拜——包括宗派问题。

二、教牧人员的教会职责与劳动生产安排问题。

三、三自机构与教会关系问题。

四、事业——包括神学院、出版事业。

也有人提到历史资料收集工作，基督教国际活动等方面，要求大家讨论一下。上午结束时李储文再着重启发鼓励了一下。

某些上层在组上暴露了一些情绪，如：吴贻芳谈教牧参加劳动问题时说：“六天工夫与鸡子鸭子打交道，第七天要他讲道，如何应付得了”。

广东谭沃心：“提了许多问题，我还看不出教会联合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是什么？……教会联合问题好像主动力量不够，好像是应付，好像带着一点被动”。

河南曾友三在谈劳动时也说：“教牧的劳动与数会工作如何合理安排，六天放牛，一天牧羊（指传道）是否合适？”“有的地方（指河南太康）订爱国公约时提出：‘不信三位一体，不信复活，不信……”又有人提出三要‘要跳舞，要喝酒，要看戏’，还来向我们挑战，认为这才算进步。我们实在不敢应战”。

鸣放得最突出的是吴耀宗，吴坚持下午不要分小组，要开大会，因为他要许话，讲话内容突出信与不信的矛盾，强调说矛盾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因此新环境中对宗教的看法与做法是涉及问题的实质，吴还引用毛主席的“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一句话讽刺说：“信徒对这样话可有二种反应，看得宽些，认为这是无神论者说俏皮话；看得窄些的就认为是刺激，拿上帝来开玩笑”（吴发言记录全文另附）。

晚上小组时有积极份子忍不住气，说话时带有驳斥吴的发言，旁边其他人赶快岔开。

上层小组只有丁玉璋对剥削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说：“说传道人是剥削倒（到）底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因为传道职业本身就是剥削，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没有人愿意传道了”。（按：据丁光训说，南京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了，丁玉璋由于吴的发言，暴露出对这问题还是存在着意见的）

上海组就是左弗如暴露了对南昌及武汉联合教会办法不满，认为这些同工说“教徒没有意见一致拥护”与事实不符，她说那边都有人来上海表示对这种做法大为不满，但不敢提出意见，左说：“他们说：‘经过了肃反、反右这些运动，谁还敢为信仰’说话？？？”

左又说：“信仰互相尊重取消掉有人会产生问题的、宗教信仰问题很细致，单凭举手通过，里面不解决问题，工作生硬，对国家对教会都没有好处”。

一般反映（中间份子）对南昌、武汉等取消一切宗教特点的做法不很满意。

刘良模在听了吴耀宗发言后闷闷不乐，晚饭后对尹襄讲：“今天吴先生这样发言，这些问题怎能讨论呢？讨论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要么大家要一片灰心，都不干了，要么就干起来，和共产党对立，还会有别的结果么？这两天汇报还是开封和广西所谈的使大家得些鼓舞，今天谈这些，会怎么开下去呢？”又说：“说出来比不说好，吴先生说他为了要刺激别人思想，他一定要这祥说（按：看来事前吴、刘商量过），我看也不必，他谈了也并没有人跟上来，现在要大家这样谈，将来提出一大堆东西，怎样引导到积极的路上去呢？”

会外情况：

一、谭沃心告诉孙务纯说：17日晚上，吴耀宗约他八时半谈话，他问吴关于崔宪祥、蔡志澄情况，吴告诉他暂时把崔、蔡安排在史料研究的工作上。谭又说，关于今后教会的上下关系问题，吴说：“如今各宗派的全国机构名存实亡，现在只是缺少一个公开宣布的手续而已。一公开宣布了，这些全国性机构便结束了”。吴还说。“今后教会的领导不会是一条条的了，而是一块块的存在，即是各省教会都存在：但须受当地的三自会或有关部门的领导”。

二、郑锡爵在19日中午对孙务纯说：“依照教会的同工和信徒的思想感情和传统习惯说，南昌的同工不可能对每月三个礼拜日不聚会没有意见，但一定是有少数人坚持每月只要聚会一次，别人不敢反对，主张每个礼拜都有聚会的人却得不到支持，就不敢坚持，结果才成今天南昌这个样子”。他又说：“厦门教会合并时，男女青年会干事一开始就主张全厦门、鼓浪屿只能合为一间，教会同工个个不敢出声”。……“有的同工以为男女青年会同工的意见是代表政府的意见，所以不敢反对他们的意见，其实根本宗教事务处就主张留两个堂，而没提一个堂，男女青年会的干事是主观一套”。

三、河南曾友三与赵复三在8月20日中午谈话：

曾：“河南太康基督教代表会议订的爱国公约说，不信三位一体，不信复活，不信……。还有一处寄给河南省三自的挑战书中说，以后要喝酒，要抽烟，礼拜堂中要跳舞等等，这些爱国公约订得离奇古怪，仿佛非这样不算进步”。

赵：“那省三自怎么办呢”？

曾：“我们讨论了以后，说这是那里的情况，我们不管”。

赵：“能否向省宗教事务处反映一下呢？”

曾：“是啊，我就向宗教事务处的同志说，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应战”。

曾：“刘良模说三自未到信徒，停在教牧人员，我说连教牧入员也没到，只在大城市”。

曾：“张光旭主教提的问题我们也有，若是不看看清楚，那我就去作耐火砖厂厂长好了”。

曾：“开封牧师中十个有八个是不读圣经的，讲道时读一段圣经，然后所讲的都是报纸上的材料，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信徒就不来了，剩下的就是些老太太，什么也听不懂的”。

曾：“象太康的教收人员还作什么牧师呢？思想教育的问题实在很大，……还有的牧师订爱国公约，订三个月作一次礼拜，仿佛隔的时间越长就越表示进步。”“平常有的问题也不想，思想也暂停了。”

19日晚11时蒋翼振、曾友三、许士琦、郑锡爵四人在平台上乘凉，曾友三向蒋打听王梓仲的事“过去看他解放后一向进步，怎么忽然成了右派”？郑大谈厦门如何反右派，蒋谈北京如何反右派。”

四、9月20日中午吃饭时，在谈及上午会议李储文发言时，李寿葆说张光旭主教说有彷徨，倒也是有道理的，有许多问题究竟怎么办的确使人彷徨，要好好研究讨论。蔡文浩接着说，去年大跃进时有许多问题由于忙于大跃进，大家把问题搁在一边，但现在情况定下来了，这些事应该讨论解决（他意思很同意李储文的发言）。教会原有东西也不全是环的。

五、李寿葆问曾友三说：“你在开封忙于生产那是好事，但你是否好好管宗教工作？”曾友三说：“是呀，如果我只搞生产那何必还要保留主教，还要算教会的工作入员呢？如果我们基督教没有特殊信息传，那又何必还要做主教呢？”李说：“许多教会原有的东西你不能说那全是帝国主义的东西一笔勾销”。

曾说：“一笔勾销全是帝国主义的东西，那教会也应取消”。

蒋翼振说：“教会许多原有的东西在帝国主义以前就存在。”邓裕志说：“教会许多东西在帝国主义以前就有。我赞成李储文牧师的意见，讨论原有一些间题不能叫作走回头路”。看情况，大家对李储文发言是赞同的。

六、8月20日晚毛克忠说：“自食其力如何理解？要教牧人员自食其力有问题的，比如去年炼钢政府要我们参加，老实说要赔本的，主要是炼人。莫斯科只有一个教会，有几千信徒，奉献很多，你说传道人就不能用奉献的钱，这不实际。”

许士琦说：“传道人参加劳动主要是政治意义，不是经济意义。”

七、曾友三说：“我现在就有困难，搞了生产很难管教会工作，有时礼拜天也没法去教会，要安排星期一的工作，究竟对剥削阶级怎么理解？是不是一定要自食其力才算是不剥削，靠奉献是不是就是剥削？那么苏联教会牧师靠奉献，又怎么解释？他们已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苏联教会的牧师如果不做教会工作，他可做社会职业，但教会内有信徒，传道人为信徒服务，信徒奉献，能不能说就是剥削？”

八、刘清芬说：“年青人受马列主义影响入党入团问题，只能听其自然，传道人不必鼓励信徒入党入团，但也不必惋惜，这牵涉到对党团看法，我们去年讨论过，是否入党入团就像从天堂到地狱？认识端正了，传道人对待这种问题心情也就舒畅。”“现在的情况又有些像56年提出三大见证十大任务时一样，好像看不到敌我矛盾，但实际还是有，譬如前不久我们那边神学院里的事就是敌我矛盾性质。”“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方式多一些，多学习，这种问题也就少想，慢慢地搁在一边，不然思想会回潮。”

九、蔡文浩在听了许士琦报告后就说：“可能在大跃进时当地领导做过头了一点，老实说江西的同工不一定通，许士琦自己也不一定通，再问他，他就显出尴尬。”

十、在这次座谈会开始时，吴耀宗和丁光训谈：“捷克赫鲁玛特卡教授神气非常，70生日国家还给他特殊荣誉，他以社会主义阵营基督教发言人自居，他关于基督教世界和平大会那篇东西内容很不好，社会主义阵营里竟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只有我们中国可以写出批评性文章。”接着吴要丁在这个会议期间写一篇有政治又有神学的批评赫的文章，丁表示兄弟国家有他们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批评了有损国际关系，国内也还是越少人注意这些事越好，省得有人想捷克做得对，中国做得不对，吴说：“你去写好了，写了只让极少数人看，也不给赫看”。他又说：“今年11月在波兰要举行筹备那个和平大会的执委会，可能他们会要我们去，我们该如何谈这问题需要准备”。关于写文章事，丁最后表示回宁后再想想看有什么可写。

**附件：1959年8月20日吴耀宗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言记录**

“这两天来摆了许多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全国各地一年多来做法很不一致，当然不能说是混乱现象，但问题实在太多，头绪纷杂。在头一天我号召大家要谈得广、真、深，‘广’在某些地方做到，真是讲心里话，但深恐怕还不够。‘深’是不但要看到现象，还要看到问题的本质，也不要把问题简单化，把深刻的问要轻轻地滑过去了，这样就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问题愈是看得深，看到本质，问题的解决就愈是彻底。我常拿基督教的思想改造来与资产阶级的改造作比较，我说资产阶级问题比我们简单多了，他们放弃定息，参加劳动，认识有了提高，全心全意拥护党的领导，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基督徒就不那么简单，总有一个尾巴，不能彻底解决，这尾巴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看到三自九年来的成就，九年多以来同工同道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但另一面也要把问题本质看看，基督教所以产生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有两个主要根源。首先基督教的传统是个资本主义的传统。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矛盾呈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矛盾。赵复三同工提大集体中的小自由很有道理。如果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这问题还易解决，像资产阶级那样的问题，我们还包括社会主义是无神论者以马列主义思想为领导的问题，这是主流。我们宗教信仰在这主流中是个什么东西？一方面我们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跟主流走；另一方面又不能一致，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举一个例子，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中，毛主席说了一句话：‘顽固派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看了后主要有两个反映，一种是看得开的人认为这是无神论者的俏皮话，另一种看得狭的就有刺做，认为拿上帝来开玩笑，感到不舒服，这是小例子，类以的例子还有许多。”

应付这两个问题的步骤我认为有三：第一是对过去的批判及重新估价，自从三自会成立后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阴谋，现在还做史料研究工作，但里面问题不简单，拿宗派问题来说吧，宗派问题包括两个问题，即帝国主义利用宗派进行侵略活动，另一是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而产生各种宗派。哪些该批判？哪些不该批判？要研究。又如批判毒素，有人认为圣经里‘罪’‘末日’……不该讲，到极端时甚至批判正本圣经，这是很奇怪的，外国谚语说：‘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了出去’。第二，是对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二方面，一方面是适应，社会改变了，个人不去适应就有困难，另方面如果你相信基督教对人生是有意义的，你应该在新环境下起积极力量，但这里面还存在人民内部信与不信的矛盾。第三，要考虑工作怎么做？神学院怎么办？出版怎么办？要根据对过去如何批判才能考虑今天工作怎么办？这是我们的三个任务。”

“根据我在前面提出的认识来分析问题，我同意同工综合汇报中存在下列几个主要问题：

一、“联合礼拜或教会合并有关的问题：一方面是与制度有关的圣餐、领洗、诗歌、堂董会等，这教问题慢慢会逐一解决的，没有什么困难；另一是宗派问题，这问题表面很复杂，实际是简单，我提出是刺激大家思想，欢迎提出对立面，我为什么说是简单呢？从毒素遗留下来的不要保留，里面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东西可以保留。至于用什么形式来保留，可以慢慢研究”。

“现在各个地方用不同的办法，如联合或合并等，将来如何演变，我认为会水到渠成，中国信徒将来在办理自己的教会时接受了新亮光有特殊认识要创设新制度、新的宗派甚至新的神学也是可能的，将采必然会这样。帝国主义对我们联合大叫大喊，也不是看重宗派，他们伤心的是老根挖掉了。如果保留旧的关系可以通过它来影响信徒。至于宗派应该保留还是废除各地可以自行考虑。总之。联合礼拜并不是很严重，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看似乎乱，但给一定时间，有了一定经验，这问题可以解决。”

二、“与劳动锻炼有关的问题：这是较为麻烦的问题，‘劳动锻炼’‘自我改造’这是天经地义的，‘改造’一般说‘红专’，‘红透专深’，‘专’没有问题，红透就有问题了，例如基督徒在工人之中，在改造中别人红透了，当然别人不会说要你放弃信仰，但在群众之中会觉得自己不能红透就会有包袱，拿别人来说可以说是‘尊重’你，就是‘容忍’你也可以，但别人看你总是多余的”。

“还有自食其力问题，原则上对，人是应该劳动，但劳动与教会工作如何兼顾是个问题。刚才谢老牧师强调爱国爱教一致性，但事实上是存在矛盾的。如六天劳动，一天照顾教会，现在信徒对教牧人员讲道的要求又高，如果要好好准备，要看参考书，又要安定思想，这是不可能的，从信仰角度看，六天在礼拜堂也是应该的，虽然不参加生产，但从信仰角度看，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虽不直接增加生产，但间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精神上贡献。因此看问题不同，处理问题就不同。如南昌一月一次礼拜，认为这样免得妨碍生产，但从政治角度看可能一月一次也太多，甚至连一年只做四次礼拜也太多；从宗教来看是不多的。因此仅仅从爱国爱教一致来看问题是不够的，要看里面存在着矛盾。”

“又如剥削问题，过去我们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是剥削。但将来积极爱国，但仍作教会工作或还全部时间工作，那么这种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剥削阶级是指某一阶级某一个而言？还是指宗教工作的本身而言？如果五天劳动，一天工作，是否还戴三分之一的剥削帽子？”

“还有奉献问题。接受奉献是否算剥削？从宗教角度说，收师为牧养信徒，接受了信徒自愿的奉献，为什么算是剥削？他不愿劳动，认为劳动不光荣吗？没有这件事。但同题本身存在不同观点就有不同结论。如果把不同的东西调和起来能够使宗教者心安理得，我看现在还没有这个结论。曾友三主教可以谈谈这个经验，我们坐办公室的人是存在这个问题，今天我提出来主要是为了刺激思想。”

三、“基督教事业。如神学、出版等，彻底地此判了帝国主义的毒素以后，但又出些什么新书？内容如何？现在还是空白，盼望在这次会上好好讨论”。

四、三自与教会的关系：这问题有演变过程，先是三自革新时期，后来为了团结某些派别，改称三自爱国， 后来又采取不碰信仰、互相尊重，提出三自是政治性的。现在有人提是太上教会，简直干涉教会内部行政了。信仰互相尊重问题以后还要好好的谈，教会联合后，其中有部份信徒是否觉得不满足灵性？联合以后应该考虑这问题。

五、宗教政策问题：这问题谈得不多，只有一、二位谈乡村教会停顿了，原因大部份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小部份是与宗教政策有关的，中央及上海宗教事务局领导盼我们提出这方面的意见。”

六、“教会前途问题：我们不能轻轻滑过去，或肯定说有前途，这是不够的。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问题的？怎样能解决？现在有人认为不要走回头路，认为这工作不光彩，或没有贡献，过去九年来有事实使这个问题产生，如年青人现在越来越受马列主义影响，如我的小儿子，过去对宗教很热心，入青年团后就放弃信仰了。青年人这样，老年人将来都会死去；又如神学生的来源现在成问题，大学生怎会愿意入神学院读书呢？那么，老牧师死了，新的年青人那里来呢？又遇批判宗教的书刊、论文，不仅受刺激，有些有信仰的人还受到影响；又如公社化破除迷信，像张光旭主教讲有人有着未发表的惶恐，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又如讲道与信息的问题，不但有真理与霉素的划分的问题，如果老是讲‘好撒玛利亚人’，‘和睦同居’等，现在大家都‘和睦’了，你还讲，谁愿听你的呢？现在社会主义愈来愈好了，过去布道家常以你们有罪，你们奸淫、偷窃……作为号召信教的人，最近美国教会复兴了，人多，年青人多，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青年入苦闷，要找刺激，如纹身、乌拉圈舞一样，过去西方传教运动以黑暗的异教徒快信福音为号召，今天社会主义愈来愈好，我们又以什么为号召？有什么信息？”

七、“对帝国主义问题：过去批判帝国主义，揭露它的阴谋，是运动式的，但是否不存在问题？如对传教事业的估价，是否一点好处没有？是否对传教士一笔抹煞？他的医院医好了一些人，学校教育了一些人。如沪江出身的人，在座很多，传教士是否都坏？又如基督教国际活动问题，过去控诉，今天还要与它发生关系，请他们来，这里面有没有矛盾？还有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里面也有许多问题。”

“那一个是主要问题，如联合礼拜、劳动、基督教事业等，如果认识它的本质，解决问题就能更彻底，以上是我的综合，一面也提出我的意见，还希望大家提出问题，把心中存在的问题谈出来。”

1959年8月24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六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21日）上午大组交流昨晚三组漫谈情况，接着讨论第一个题目：“大跃进以来在宗教生活安排上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也产生了一些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下午分成两组继续讨论（继续鼓励鸣放），大家又进一步敞开，下午分组后情况更好一些，一般能谈些心里话，敞开情况可分几种类型：

一、发牢騒说谬论。如左弗如、缪秋笙。

左弗如再次强调聚会处信徒不满情绪，如“头可杀，信仰不可变”，还说：“如果取消‘擘饼’（聚会处的一种仪式），那我只好退休了……

缪秋笙说：“年龄大，进步慢必须像我这样经过大震动，‘棒头出孝子’，一棒、二棒、三棒打出来的……我这样一天忙到晚做不出什么，剥削帽子只好戴到棺材里去了，也没勇气‘哼’一下子，心中十分不安定……”。

二、坦白提出自己宗教主张。如谢永钦、程步云（谢近日来更开朗，情绪也较高）。

三、部分中间份子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正面主张与看法，客观上驳斥了吴的发言，如河南曾友三。

少数上层不着边际的胡吹与捧场，如吴高梓、毛克忠。少数积极份子对‘弛’的体会不够，忙于解释，把话说到边，使别人难以发表意见，不善于循循善诱。

陈见真始终说空话，没有具体意见。

上层中不少人对吴的发言觉得“的确是问题，但是这问题没有办法谈，谈不出结果来。

有些上层（如熊真沛）表示对这个会摸不出底，涂羽卿、江文汉直接问李储文：“会的要求是什么？”

吴耀宗在小组中在大家发表关于联合礼拜等具体问题后，又试图点一下火，他说：“问题不在联合礼拜等某一个问题，而是在整个基督教的问题”。又说：“在今天大集体小自由的情况下（有人提出问题是如何安排大集体与小自由关系）能否做到一个地步能满足信徒的需要，

矛盾还在两方面。”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二）无神论者领导下小自由存在很多问题，在这小自由范围内能否做到满足信徒需要，这不是联合礼拜做法问题，是大集体与小自由之间的矛盾，……当然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启发我们，我欢迎这样的意见。

会外情况：

一、8月21日晚丁玉璋与韩文藻谈，他说：“传道人是剥削，究竟是传道人的原故还是传道工作的原故？譬如说，我们的政治思想改造好了，当然不可能这样。我们干别的工作就不是剥削，干传道工作就是剥削。譬如一个在政治思想上改造好的人他就愿意传道，这对社会主义究竟有利，还是不利呢？今天有信徒，我们不干传道工作，他们就出后门搞得很混乱，到底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

二、丁玉璋对吴耀宗8月20日下午的发言受一些影响，韩文藻问丁玉璋：“吴耀宗在发言时每一句每一段我都听得很清楚，但综合起来看一下反倒不清楚了，你对吴先生发言如何理解？”丁说：“主要是两个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宗教的矛盾，有些问题从马列主义角度和从宗教角度看不一样，比如说，前不久张局长（江苏省宗教局）做报告，他说你们的史料工作才是工作，可以结合史料工作进行改造，在张局长看来传道工作不是工作，当然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也体会到有两条道路问题，所以我在修订改造规划时把教牧工作改成教牧事务，因为这在张局长看来不是工作。”韩问：“这样岂非更费解”。丁说：“这是自我改造规划”。

三、8月21日蔡文浩似乎也较前活跃一些（按：蔡文浩一直表现很沉默，抑郁得很）对别人的发言常有短评，例如对谢永钦爱国爱教一致的言论。蔡说：“这太天真，在民主革命时爱国爱教容易一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就不同，要求高了，要爱社会主义的国，矛盾是有的”。又如对曾友三的发言，蔡说：“老是反问问题，这不解决问题”。

四、河南曾友三谈前途问题：

“在开封学习时，谈到我们的煤可以开采3000年，有人问三千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何必为这很远的将来担心呢？去年在开封提出自食其力的问题时，我儿子说，爸爸可以去开汽车，我说今天教会有信徒就有我的工作，我还应在这里工作。”

“可是我在教会中是否千方百计去发展信徒呢？是否要去拉人来教会呢？我认为不必。”“在开封有个牧师，他是区代表，他想，我当选区代表是因为有几个堂，有多少信徒，略是堂少了，区代表就当不上了。”

五、江文汉对丁光训说：“大家对劳动是很有意见的，例如毛克忠，他是主教，叫他也和别人一样劳动的确不太好，这些日子以来他打苍蝇，捉蚊子，发大水时也和别人一样去搞，口里不说，心里是不大满意的。这里反映了江自己的态度。邓裕志对谢永饮说：“不劳动就是剥削者吗？”

六、郑锡爵说：“曾友三不做礼拜心中还不觉得什么，他算什么教牧人员？对信徒影响如何？”“吴耀宗先生的发言说明他很爱教会，他说得坦率，把许多心中的感觉说出来了”。

七、吴贻芳与丁光训谈话如下：

“开了这几天会，突出印象是各地教牧人员都只忙于应付实际问题，没有在深深思考，从神学和信仰方面去理解今日的问题，研究教会应怎样办？只有吴耀宗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就是他所指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基督徒少数在以无神主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里的问题，我看吴耀宗此人信仰倒是坚定的，我想建议让他好好演讲一次，你知道国外和中国教会里有许多人一直说他信仰有问题。”

“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明哲保身，就是适应，就是随大流，这一年来教牧人员就是这样，他们处理问题近乎做了再说，不怎么考虑宗教原则，今天缪秋笙谈得对，他说，以前外国有人为了浸礼会的信仰不惜去死，这何独宗教方面呢？人家为政治信念也如此，可是中国民族性不是这样，你看中国文学里的悲剧都是拖得很长很长的，例如长恨歌，什么主角自杀啊，把对方杀掉呀之类的结局是少见的。”

“共产党讲政治挂帅，从前我们不懂，总觉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所有的方法不对，尼赫鲁曾告周总理，中国在西藏的目的即使对，但方法不好。芮陶安（Audrow Roy，美国人，前金陵大学传教士，在反奥斯汀谰言时被驱逐出国，现在香港做传教士）他是去过延安的呢——也说过，共产党的目的好，但他们所用的方法要和目的相一致才好，否则目的至终会达不到。我在金陵女大时多次通不过原因就在此，那时我心里也知道，我作为基督徒必须对人诚实，对自己诚实，叫我去控诉去咒骂我是办不到的，后来我认识到建设新中国一定得由共产党来领导，而我们基督教的关系原是很薄弱，所信的仅仅是宇宙之中有一个‘道’，是美国富士迪牧师说这也算是信基督教我才算为基督徒的，我就不管基督教原则了，这样能更便于我去接受共产党的做法嘛，我就通过了，后来何成湘一定要我到基督教来开会，我才重新和基督教发生了来往。”

“我见到共产党员是什么也说的，一次我说，按你们看法，宗教是会消灭的，那么你们何必这样急呢？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吴耀宗提到毛主席说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一语是对上帝开玩笑，我立即想起另外一句，就是‘人民教师是灵魂工程师’，这是误用宗教界的名词了”。

“缪秋笙今天谈到了他自己的政治态度转变历程，说是‘棒头出孝子’，可想而知，他一次两次吃了多少棒头，别的教牧人员也一样，大家怕得很，你知道上次各大学插红旗拔白旗的事，这是对老教授的最后的一棒，多少人吃了棒头呀（说时摇头），学生随意指指他们的问题，大字报贴了不知多少，弄得大家都消沉下去了，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了，今天我们是被认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像教收人员被称为剥削阶级，大家对改造很厌倦，周总理在全国人代还说改造是长期的哩”。

“涂羽卿所提出的教牧人员在社会的地位问题很可以让大家谈谈”。

1959年8月25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七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8月22日（星期六）上午大组交流前一天两小组讨论情况，接着分组讨论，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晩上自由活动。8月23日（星期日）晩会务会议扩大会讨论本星期程序，决定今天继续讨论一天，星期二转入形势讨论。

讨论情绪日趋热烈，也逐步敞开，吴耀宗几次露骨谈话（见附件）很引起一些上层的共鸣，吴也意识到他的话有一定的市场，所以表示兴奋，对会议基本上满意。

讨论内容集中在传道人的阶级属性问题，到底是否剥削阶级？是否一定要参加劳动，因而提出宗教工作专业化问题，强调宗教工作要满足信徒需更，要重视宗教特点等。不少上层显然对“改造”有抵触情绪，想取得合法根据来发展宗教。

有些中间份子（如河南曾友三、广西沈明燧、南昌许士琦）想从客观现实来说明劳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上层很不满意。

吴耀宗突出的要把讨论引向教会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本身的矛盾，强调“虽然社会压力很大，但是不管别人如何看，人家（指马列主义者）如何说，只要我认为我做教会工作对社会主义有贡献，我就不必自卑……自食其力，不一定是要双手生产出来才算，做全时间教会工作对社会主义也有贡献。”

吴对河南曾友三、广西沈明燃、南昌许士琦等提出“教牧必须要参加劳动生产来进行自我改造，剥削与否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愿望能决定的”的话非常不满，会外对人说：“这是一边倒的意见，没有碰到问题的实质，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一套东西，谁不知道，这样说不解决问题，应该说到底信徒要求有否满足，信徒的问题有否解决。”并在大组上公开号召大家：“不要被某一派思想压倒，不要感到压力不敢说话”。23日（星期日）晩在会务会议上吴又强调要另树一题谈“教会前途”问题，说：“这是存亡问题”。

吴的“放”对上层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人过去闷在里面的问题，经此一挑，又重新暴露出来（如武汉陈建勋、南京丁玉璋、吴贻芳、广州熊真沛等）有些中间份子过去对问题并未搞通，今天一翻，头脑有些发乱，上海有些头子（如陈见真、戚庆才）对吴的讲话，不敢断定究竟，因此不大说话。

邓裕志几次三翻反驳曾友三、蔡文浩等发言（这些发言内容部分是否定吴的意见）并且情绪激昂，会外还替吴辩护。

左弗如对尹襄说：“我真不满河南广西等发言，都一边倒，这样别人还说什么，幸亏吴耀宗先生谈了话，否则谁敢说话。他们（指河南等）说这会开得不好，我党得这会开得真好”。

福建郑锡爵一味自吹并对吴捧场，说：“马克斯也只能预测一个阶段的事……我们要搞新神学，用‘百花齐放’的手段来搞……我们的工作有极重要的世界意义”。并露骨的表示自己‘九年斗争功劳大，今天反而戴上了剥削帽，讲不通’。要否定“剥削”的说法。吴耀宗很欣赏郑的发言。

8月22日晚大家情绪仍很高，晚上自由活动时继续讨论，情况如下：（自由结合）

熊真沛：（联合礼拜是否还要继续贯彻）广州联合礼拜就是未赶上运动，宗派是否要加以取消？我主张不取消宗派，成立全国联合会，广州协和神学院学生来源不成问题，问题是教学方针。

郑锡爵：“现在形势改变，改为‘和风细雨和平改造’，不是一棍子打死，所以也不扣帽子，我们这次会就是这么开，三自工作人员不一定参加劳动；编史料一样可以改造思想，现在宗教界自办生产事业是为了‘留后步’，将来需要时还可调回来”。

曾友三：“全国三自在上海，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要说教牧人员可全时间作教会工作，我是坚决不再这样了，我过去心情苦闷，自从大跃进，炼钢以后实在心情舒畅多了”。

许士琦：“基督徒过去可以去骂佛教，骂伊斯兰教，今天我们说别人对我们有什么压力，其实这还是想特权。”

曾友三：“基督徒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好，别入一样重视，非基督徒在生产劳动中表现不好，别人一样轻视”。

蒋翼振：“吴先生讲社会压力是为了树立对立面，启发大家，我想也许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能合而为一”。

郑锡爵：“过去形势是‘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现在的提法是‘积极服务，加强改造’，我们写史料是阶级斗争，很重要。我们是三自领导人，要看得远才能领导”。

曾友三：“教会将来人数还要少，上海现在信徒多，也是暂时的。但这不是等于教会就要消灭，没会前途是很长的，至少在我们一生中看不到头”。

郑锡爵在会外与丁光训谈话：

郑锡爵：“传道人是不是剥削者这个问题我们教会上层领袖应当好好讨论，但是不必叫广大教牧群众大事讨论，他们的政治水平低，搞不清，反造成混乱，对他们只好根据他们的水平能提多少提多少。在讨论联合问题时，不必联系剥削问题。只要提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了，我们厦门就是这样的，因之改造问题也没有多谈，主要只谈了用物力支援社会主义”。

武汉陈建勋在讨论后与陈中洁谈话：

一、同意宗派虽然将趋于消灭，但目前还须存在，其信仰特点要照顾，这是“信仰自由”，认为回武汉后要考虑恢复圣公会早圣餐，与地方教会（聚会处）擘饼聚会。

二、认为奉献不是剥削，今后传道人还是应该靠奉献生活，“人民生活提高了奉献当然会多”，他认为这是圣经里的道理，今后传道人只要义务劳动。

三、认为吴耀宗讲“自食其力”不能机械执行的话非常对，对他帮助很大，认为郑锡爵发言好，“人很进步”。

四、认为涂羽卿讲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五、起初同意江文汉讲“传道”作为一种职业不能算剥削，但又想想不妥当，他说宗教工作者别人看来和算命拆字有什么分别？因此还不能肯定不是剥削。

六、认为不该说传道人是剥削者，认为武汉社会主义学习中，没有很好分析，这儿才解决问题（其实武汉辩得很明确）。

七、认为学习中（指武汉）没有区别一般传道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其实大多数传道人解放后有转变”。

曾友三（河南）对陈中浩谈：

一、对吴耀宗不满意，认为吴耀宗是脱离了实际，说：“涂羽卿的话说得对，你不能主观这样想，不管客观现实。从前有人批评吴先生不管宗教利益，我觉得他太为宗教利益着想了，有一年到开封，他在座谈会中说：我手中有河南的来信，说干部如狼似虎，我听了简直发抖，后来市长也就不客气了，说偏差是会有的，但说干部如狼似虎，不妥当吧”。

曾认为“上海全国三自落在内地的后面，自己不想变，还认为人家不应该变”。

又说：“‘存在决定意识’，邓裕志说公社食堂吃饭可以‘买’，她只想到用钱买，不知道一个人脱离社会，脱离集体是怎样一回事”。

丁玉璋对韩文藻说：“我忽然有一个思想，宗派感情是不是要适当考虑，我回想自己近几年来很忽视宗派问题，原来长老会在宗派问题上是保守的，但到神学院联合后慢慢淡薄了，这次开会又引起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左弗如的发言，她说：‘你们总说聚会处的信徒与联合礼拜为难，但你们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们过去是为了教会倾家荡产的’。我想我们回去应该研究一下，如果有人很为这事难过，譬如安息日会是否可以在礼拜六专为他们有一个礼拜”。

**附件：8月22日上午吴耀宗发言记录**

“关于传道人地位问题，邓裕志先生提过两次，有人问她干什么工作，她觉得很自卑，也有入说‘你还做宗教工作么’似很希奇的，登记时有一项写‘迷信职业者’，这东西如临到我身上，我吃不消。这些现象有些情况是社会压力，并不是有人告诉你说‘传道人没有地位’，这是间接的。如果在小地方，或在乡间，问题就比较严重。人民公社成立后提出破除迷信，在技术革命时你迷信专家是提出破除迷信，但也包括对宗教在内，在发展生产时搞破除迷信，包括‘风水先生’，‘算命的’，‘道士’，亦牵涉到宗教，例如在河南有一人民公社开群众会，把算命先生请来。其中也把一个牧师找来，辩论为什么会下雨的？也问那个牧师，他说东海龙王把……我这份剪报还有，后来大家都哈哈大笑，觉得毫无道理，结果辩得让这牧师等哑口无言，最后这些人都转业，包括这牧师在内，当然这是个别的，但就是没有发生这样事情的地区知道也会震动的。至于农村照顾礼拜，认为是多余的，你自己觉得有压力，别人是容忍你，又如大学生写毕业论文，其中有哲学上的问题，也就是碰到唯心唯物的问题，会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这个时候有入就踌躇，有人甚至说我反对唯心；有人避而不谈；看卷的人看到写得不清不楚就知道是信徒，有的可能说我是基督徒，如果反对唯物主义更不妙。有人问我该如何，我也难于答复。这并不是说外面有人说信徒怎样怎样，但社会上有一种压力，思想上就存在负担，特别是剥削阶级问题，是由于历史原因，为资产阶级服务，未参加生产，但今天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参加生产了就行，是不是这样呢？对文艺工作者也没有希望他们自食其力，宗教职业者如仅仅是为了过去是简单的，如永远与剥削是分不开的，

宗教工作从不信人的角度看是否没有贡献的，是否始终是剥削性的东西。

“在公约中提出自食其力，其中矛盾很大，是如何兼顾，宗教是我们信仰，对信徒是宝贵的，就是全部时间搞宗教工作也是有理由的，是应该的，与文艺工作者写小说的也是一样是脑力劳动，如不这样看问题就很大，要自食其力，宗教工作者只能是业余或半业余的了，不去劳动的部份就被带上非自食其力，宗教工作者一面有压力，一面是负担，刘少奇同志提第二个剥削阶级，自己也提自食其力。”

“这个问题也就存在后继无人的问题，有人动摇了，青年人视为畏途，认为这路走不通。既有几十万信徒，牧养的人现在已缺少，继续工作的人在动摇，未来的不敢来，因此，传道人地位及贡献这是个问题。”

吴耀宗在8月22日下午的发言记录

“今天第一组谈到传道人地位及阶级性问题，传道人感到有社会上的压力，觉传道这东西有问题，是迷信等等，因而产生思想负担，‘不光荣’‘不念神学’‘想转业’等，我们传道人包括机关工作者，我自己也在内，别人如何看我们，没有办法，人家不信宗教，认为迷信，信马列主义，认为宗教是唯心论，别人采取什么态度那是别人的事，别人的态度当然会受影响（如对会道门的看法就低），别人认为宗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迷信，这没法子，因为根据马列主义是这样，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产生了包袱，自卑，这是要不得的。我说要看我们自己，前半段韩文藻说这是我们信心的考验，值得体会，如认为我信的上帝是真的话，是统治宇宙的，无所不包的，这个信仰不是别人批评一下就会改变的，如果批评一下上帝就没有了，好像过去宇宙有上帝，现在没有了。这就反映自己的信仰，应该反躬自问，是否自己信仰有什么问题了，觉传道不光彩，要改行，如我们有自信，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并且是真理，它对今天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贡献的，不会因有人批评而损害，就会心安理得，发生自卑感，如邓先生那样怕别人问，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他问他的，我觉得很光彩，地位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在新社会中当人代、政协委员不能说没地位，政府也不歧视。如果主覌敏感，神经过敏，主观是一个重要因素。关于阶级性问题，是否剥削阶级，从逻辑说你既非工农，就是剥削阶级，当然我们不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是其他一类的剥削阶级，一方面从过去历史角度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我们曾为帝国主义服务，从历史讲是属于剥削阶级，既然是剥削阶级就要改造，参加劳动没问题。问题在传道人的职业本身是否剥削阶级，好几位说不是剥削阶级，我自己基本同意，问题不在你的职业，而是你所做的事是否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不是全部要自食其力才算不是剥削，我们党政领导人也不是六天劳动，他们是脑力劳动，还有机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不需要全部时间用劳动来养活自己，因为他们这些工作，虽不全部生产劳动，但间接对生产劳动有贡献，没有机关工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农能做得完了吗？因此脑力劳动者还是有贡献的，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者，看是否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如果宗教工作者经过改造后，直接参加劳动对社会主义固然有贡献，如果教会工作者使信徒（有工农群众）过好宗教生活，使他们心情舒畅，尽管别人说是唯心，但对社会主义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但是宗教工作者应该做的，作为人民也是应该做的。我认为如果贯彻爱国爱教，把教会搞好，自己主观会感到已改造到了不是剥削阶级，与工农、机关工作者一样是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我意思是我们不从剥削阶级去钻牛角尖，而是宗教工作是否对人民有贡献，如果作到这一点，改造就到了一定的地位，心情负担可以去掉，别人对我们也会另眼相看，到了那个时候，不仅是政治地位，连人民看待你也会无形中改变了”。

8月23日晚吴耀宗在会务扩大会议上发言记录

“听了汇报对各地情况更了解了一些，你赞成不赞成是另一个问题，至少背景清楚了，广西方面做到了，大家问题都拿出来了，深也比较深，真也较接近了，过去的开法没有计划，不是在谁的口袋里，大家都是在摸。大组小组结合交流的方式较好，舒惕，交差也较为坦白，有时短兵相接，对一个问题不是讨论得相当彻底，到了相当的时候就转到另外题目，原因不单是时间，更主要的是问题相互关联，转入另一题，并不等于把前面的丢开。总的问题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如何把教会办好，都和总题相连，当然转得过早不好，转得太慢要疲沓。现在从过去六天提出的问题分析一下，究竟都提出了那些间题，我花些时间分析了一下大家所提出问题的全貌，假定还有一个礼拜，大体上怎么进行，综合起来六类问题：

第一类：联合礼拜，教会合并有关的问题。

（一）同教会仪式有关的，如圣餐、领洗、捐献、诗歌、婴儿洗礼、礼拜次数；

（二）同教会制度有关的堂董会、封立牧师办法；

（三）同教会工作有关的如拜访、团契、查经班、主日学、追思礼拜、为病人祷告。这中间又包括三个问题：（1）各地做法不同，要不要统一规定，还是因时因地制宜？（2）我们是不是太过强调与人民一致，强调政治挂帅，服从生产等方面，而对宗教感情，信徒需要，教会合理的传统等强调得不够，（3）在大集体中小自由的问题是否能得到适当的解决（这是更大更原则的问题）？

第二部分：同宗派有关的。

（一）宗派是否包括两个成分，一个被帝国主义利用部份，一个是从真正信仰出来。

（二）宗派是否可取消或听它自然演变。

（三）在宗派系统下的地方教会对上级有人事经济依存关系，怎办？

（四）某一宗派的某项优良传统，是否能予保留（不是保留宗派）。

（五）未来中国教会是否必须统一宗派。

（六）联合礼拜是否与互相尊重有矛盾？

（七）所谓信仰特点究竟是制度？抑信仰？

第二类：与劳动锻炼，自我改造有关的问题。

（一）宗教工作者属剥削阶级是由历史原因或传道工作性质，如何才能摘掉剥削帽子？

（二）从事劳动生产与适当照顾教会工作是否存在矛盾？

（三）宗教工作是否只能作为业余工作，不能全时间？

（四）自食其力应如何解释？

（五）在人民公社中宗教生活是否能合理安排？

第三类：神学、出版、资料研究等事业。

（一）目前存在什么困难？

（二）困难怎么克服？

（三）在目前形势中我们对这些事业的要求是什么？

第四类：三自运动同教会的关系。

（一）作为一个反帝爱国的运动，三自是否可以领导教会？

（二）教会是否应当有它自己的体制？

第五类：教会前途的问题。

（一）在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新中国里面教会的前途是什么、教会有没有前途？

（二）基督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信息？

（三）传道能否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六类：关于帝国主义同国际形势问题。

（一）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传教事业和传教士是否应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二）我们控诉了帝国主义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又要接待某些帝国主义份子到我国教会来访问并且同他们保持一些联系？

（三）今天国内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这个形势同中国教会和我们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有何关系？

1959年8月26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八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25日）上午大组讨论漫谈“形势”，都谈正面一通，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会场很沉闷。

涂羽卿、陈见真、江文汉等谈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体会，表态一番，缪秋笙就为了服务生产减少服务性行业情况发了一些牢騒，从而提到服务性行业重要，宗教工作也是服务性工作，因此重要。吴贻芳（向群众关门）大谈应如何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还说：“共产党领导有一定的步骤，到什么情况就提出什么条件，用不同的做法”。

吴耀宗对上午讨论很不满意，说：“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下午分两组（外地组和上海组）进行继续漫谈（部分上海的上层参加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

外地组仍旧没有提出什么问题，积极份子就人民公社、苏美关系、统战问题、民族独立国家等问题点了一下，但吴贻芳、蔡文浩就赶忙长篇解答，讨论无法展开。

上海组集中谈了民族主义国家情况，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江文汉提出：目前来看东风确实削弱了些，阿联、伊拉克、印度等都是说明情况与毛主席在莫斯科谈东风压倒西风时情况不同，当然我不是指将来情况，但目前来说东风确是受了一些挫折。吴高梓不同意江的话，强调人民力量日益增长，但又说不出具体理由。江文汉接着又反驳说：“印度喀喇喇邦共产党被搞垮了算是人民力量增长，那么全世界共产党都搞垮了才是人民力量大大增长吗？（大家哄堂大笑）

毛克忠原来同意吴高梓的话，跟着吴高梓空谈一番，后来又说听了江文汉的话，觉有理由，又同意江文汉的意见。谢永钦说：“虽然目前的情况如此，但是将来东风一定会压倒西风”。

吴耀宗在会议中的态度：

吴耀宗对这次会议表现非常积极，一直住在会场中，除周末外没有回去过，晚上经常找外地来的人个别谈话，所找的人大多是中间人物（如广州谭沃心、熊真沛，河南曾友三，南昌许士琦等）很少主动与积极份子谈话。

在会场中很用心记笔记，听得非常仔细，平常不愿主持会议（做主席）说怕妨碍他记笔记，上星期日化了一整天整理自己笔记（并且拒绝别人帮忙），把一星期讨论归纳成六类问题，并且说：“下星期我还要再一次整理笔记，归纳问题，最后还要把讨论的问题总结一下，下个结论再给大家去讨论一下，再下星期二就可以结束”。

8月24日晚吴耀宗约河南曾友三去复兴公园喝茶，据曾谈：

一、吴先生怕他早晨说的话引起我误会（因吴说过不要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某些人发言对别人思想是压力等），所以要向我解释。

二、他对这次会认为满意。

三、他打听河南人民公社现在情况。

四、吴先生说，形势准备谈一两天，然后谈神学院、出版等事业。

曾说：“使我伤心的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好像我一强调生产，有人就说这是不爱教”。

8月24日晚间西安王道生谈：“这个会议谈到现在，联合礼拜也对，不联合礼拜也对，这怎么搞，总得明确要联合教会，要取消宗派，否则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而没有结论。这次到上海来开会，总以为大地方有好经验，可以学学，谁知不然，像上海那位收师（王矶法）说，把奉献是否剥削这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可是，就算说好奉献不是剥削，回到各地走不通的。”

“如果把宗激生活与生产看成矛盾，搞搞就搞到右派的路上去了”。

8月25日早晨吴耀宗对丁光训谈：

一、“会议上所反映的各地基督教情况和我原来所知道的大致相同。”

二、“对河南等地大搞生产，江西缩减礼拜次数，南京不准为病人祷告，这些做法原先我怀疑，是不是好。经过大家讨论，显然大家都认为这些是不对的”。

三、“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家情绪很好，对会议满意”。

四、吴问：“你听到什么对会议的意见？”丁告他有人表示关切会议的前途，希望会议对有些问题明确些。吴说：“当然，过几天我要做结论的”。

五、燕京神学院房子很大，放弃了很可惜，你去想想有什么办法把它们保留下来，例如办函授科，办金陵分院，或什么别的，以备将来需用，常有人在北京要参观也是一个理由，只要中央同意，叫现在租用人搬出去是容易的”。

1959年8月28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九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8月26日上午大组讨论就“国际形势”提问题，下午分三小组继续讨论，晚上听广播。

在讨论国际形势时，逐渐暴露出不少人认为东风压倒西风说法是指长久将来，目前阶段不一定这样。对国际局势不少人抽象的都承认局势更加缓和了，但在具体问题上无法说明缓和的现象。

讨论中显然有些人对问题并没有搞通，被人一问就无法自圆其说（如福建郑锡爵）。

对民族主义国家大部份认为向右转，不算为西风也至少是南风。讨论中还透露害怕原子弹情绪，刘良模说：“如果一旦打仗大家完蛋”。会后程步云不同意刘的话，但刘坚持“当然大家都毁灭”。

对美国看法作过高估计，陈建勋说：“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是起主要作用”。缪秋笙说：“艾森豪威尔去苏联当然可以受到教育，除非他是花岗岩头脑”。程步云说：“苏联最近也宣布采取分期付款办法，大概是米高扬去美国时学到的一套”。郑锡爵说：“艾森豪威尔有两面性”。

吴耀宗8月27日午餐后对李储文、沈德溶、施如璋谈这会今后如何开法时，吴说他正在把大家讨论的归纳一下，那些问题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那些是大家不同意见的，那些是不对的，然后把这些归纳的问题再交给大家去讨论，希望讨论后能弄出一个类似总路线的口号，这样大家回去才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遵循，大家才会满意。李储文问：“有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不大可能？”吴说：“不是下结论，但是有个口号就有个方向，最后结论要在明年全国会议去搞，党搞总路线也不是一次就搞成的，也是经过三番四复讨论而出来的”。

1959年8月31日

【机密】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8月28日）上午大组交流各小组昨天的讨论（八届八中公报），随即分两组（上海、外地）继续讨论，全国性领袖除少数人去参加宗教局会议外，分别参加该两组讨论，下午分三组继续讨论。

讨论比较疲沓，内容正面的多，主要发言见附件。

会外反映

一、左弗如说：“我们教会内也应该用公报的精神来纠正一下某些左倾的做法，一个月聚一次会显然是左倾”。

二、熊真沛对孙务纯说：“这个会究竟如何开下去，实在是问题，形势问题再谈怕也谈不出东西来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回到地方还是要学习的，目前会议中涉及的问题过多（指小型座谈会），这么多问题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星期解决，看来座谈会一定要拉长，但迄今尚未公布，这样的没有固定议程的会，真是有点麻烦，我们参与会议的人也有点莫所适从”。

熊还估计已提出主要问题是：三自会和教会关系；劳动生产；三自运动今后的方针任务。

三、厦门郑锡爵对会议估计说：“有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总要回到地方解决。联合礼拜问题和宗派问题上周已谈过了，形势也谈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谈的问题，看来宗教政策是一个专题，还有神学院、基督教出版工作、接待外宾等问题”。

郑又说：“这个会主要还是为明年的全国会做准备，所以普遍让大家提问题，发表意见，然后综合起来，由吴耀宗与政府领导部门交换意见，然后要写出一篇工作报告，其中总要肯定过去一段的工作成绩，提出存在的问题，订出今后方针任务，所以会议不必太肯定什么问题要肯定得在全国会议”。

又说：“上海名为取消宗派，但实际上这个堂采用圣公会仪式，那个堂采用安息日会仪式，故实际上宗派仍存在，取消宗派在厦门说来，却是不容易的问题”。

四、广西沈明燧表示对这个座谈会感到惶惑和不满，认为：“许多同工忽略了肯定成绩，相反地却发表了许多复杂古怪的意见，有些必须肯定的原则（如教会同工从事劳动生产及自我改造）却含含糊糊没有肯定。现在两周将过去，觉得时间有些浪费，今后座谈会如何开，心中很疑惑。”

五、厦门郑锡爵也对陈中浩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全国三自要写报告所以召开，接着还说：“从前写报告可以在办公室里写，现在不行了，过去报告后大家举手，现在右派去掉了，都是自己人，问题就要大家来谈，如果写得不对，大家就要大提意见。修改太多也不好，所以先叫我们来开会”。

六、吴贻芳说：“对公报的反映就是要看我们对党信任不信任，这也可以说，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经过这几年学习，这点考验还经得起”。

七、天津刘清芬和李寿葆说：“这次会议最主要的问题要谈谈安排问题（意指即使安排传道人七日劳动也未见得一定改造得好，要看如何安排法），还有剥削问题，认为最好大家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谈具体问题。刘还说传道人要专业问题很难说，现在那一行工作不要兼顾别的，不要劳动。

刘对吴的发言说：“吴先生大概是为了启发启发我们的”。

八、杭州蔡文浩对沈德溶谈对这次会议意见：认为宗派问题不重要，现实情况如此，可暂时放一下。传道人要不要专业化的问题倒很重要，应该谈谈清楚。现在似乎沿海地区的同工，一般都不赞成传道人搞生产，我看这问题应好好谈一下，这是根本问题，牵涉到传道人自我改造问题……有些具体问题，只能回当地解决，主要要谈谈基督教今后前进方向问题。

蔡文浩对吴耀宗发言内容不表示什么意见，特别关心史料工作如何搞，希望与各地交流这方面的经险。

九、厦门郑锡爵对孙务纯说：“假如教牧人员不能专业，就等于共产党消灭教会。如说信徒奉献是受教牧剥削，教会也无前途，神学院将无人问津，基督教就绝嗣了”。

十、广州熊真沛告诉孙务纯说吴耀宗告诉他们（熊与谭沃心）听说城市中永远不成立人民公社，所以教会工作没有问题，熊还补充说：“城市与乡村情况不同，共产党对城市和乡村的政策也有区别，所以不必提心城市中传道人的职业，是可以专业的，不过还得从事部分劳动生产”。

熊对宗派问题，强调取消宗派不合实际，因信徒对宗派仍有感情，……但是三自爱国会领导教会名称有不适合之处，应在明年全国会议时……如果广州搞联合礼拜，应提出各堂信徒可以保留原有的会籍，原因是教徒宗派观念仍深，例如圣公会某信徒捐了一笔钱给教会，听到教会要联合，赶快去找牧师要回那笔捐款，说要等联合后看看有无圣公会仪式制度，如有再把款奉献。

十一、广州谭沃心对李寿葆说：十分赞成吴耀宗的发言，“这些完全是我在广州时说的一样”。

十二、吴贻芳找李储文说：“前天（8月29日）刘部长请吃饭，我与盛局长谈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是不是搞得快了一些，如南昌，每月只做一次礼拜，我不明白是不是政府要很快的把教会问题这样来整理，这实在是一个速度问题。盛局长说：政府并没有这样做法，所以我觉得吴先生在他的总结中最好能够就速度这样一类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使各地能带一些有指导性的意见回去，你是不是可以跟吴先生谈一谈”。

十三、武汉陈建勋对开封桂林南昌做法不满，对传道人可以‘专业’思想很坚持，说：“那些地方没有专业传道人，主教不像主教了”。但同时又觉得社会上对“专业”怕有不好的看法，说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不决定于宗教，而决定于反帝工作，因此对“专业”又有点顾虑。

十四、广州谭沃心这两天来神态较低沉，昨天上海蒲贯一牧师和另外几个人来找谭，最近几天清晨谭却一早就出去，约八时许才坐三轮车回来。

十五、李储文找曾友三、沈明燧谈话，二人都有些顾虑这个会议会否草草收场，问题系联合礼拜到底搞得对不对，劳动生产到底对不对，都没有解决。李告诉他们会议总要谈些一个头绪，决不草草收场，他们才都安心。

沈明燧建议可否请上海工作人员向外地来的人传达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内容。

注：附件请看“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情况反映”第五期

1959年9月2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一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8月31日）上午吴耀宗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吴耀宗的发言在形式上与前几次发言略有不同，不少地方以进步面貌出现，在过去一贯强调的根本性矛盾问题上（信仰与社会主义及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今天谈得比较隐讳（估计可能与这两天报纸发表的反右倾文件有关）而突出宗教来取得人心，因业模糊作用较大。谈形势时把中国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都说成：“不是什么人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上帝在其中运行必然发生的现象”。并称：“我不仅提高到政治水平，而是提高到基督教信仰水平来看形势”。他提出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任务说就是：“更有力的警惕基督教福音积极性，更好的在新时代中为福音做见证”。又说：“让我可抱着充分的信心，将表必有合而为一的新教会出现，必要有新面貌，必有新的神学系统”。

在发言中散布了不少毒素，在提到教会工作时，吴说应该要批判旧的传统，接着又说：“一切有利于教会发展的东西都可以保留”。关于考虑教会问题时他先说不能单从教会利益出发，也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认为这是原则，但接着就说：“但这原则要灵活运用，不要当作教条，否则就有偏左偏右的危险”。还激励大家应该回去检查工作缺点，对工作成就却一字不提。

吴在教会前途问题上发挥很多（这问题群众没有谈过），并突出谈教会前途之所以成为问题，由于四个原因，除了第一个原因说是由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宣传共产党消灭宗教所致外，其余三个原因都说成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原故。（一）由于解放后教会变动（摧毁教会学校与医院，教会关门，清除败类等）。（二）大跃进以后情况（联合礼拜、反右斗争，参加劳动等）。（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宣传无神论，批判宗教小册子等，显然把教会前途之所以成为问题都归罪于社会主义。

在解释马列主义是否对基督教有威胁时，吴先表示不是威胁，但在说明理由时则说：“马列主义迫使我们（基督教）更坚定信仰，迫使我们要从生活上、思想上证明信仰上帝的意义……因此马列主义对我们不是威胁，而是良师益友”。

发言中吴也很狂妄地流露以国际基督教领袖自居，要研究新神学，说只有中国基督徒才有特殊经验，这种经验是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信徒所没有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徒也不尽相同，借机还对匈牙利和捷克教会举行广岛原子弹忏悔日予以公开否定，说中国不赞成这样做，来挑拨兄弟国家之间的团结。

在谈基督教国际工作时，吴强调今后要灵活些，不能像以前那样“僵硬”。吴还提出所谓基督数总路线“贯彻基督合而为一的教训，办好中国信徒的三自教会；加强自我改造；继续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阴谋；与全国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为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积极努力”。叫大家研究以备明年全国代表大会用。

在整个发言中，除对过去一年多成就只字未提外，也完全没有提到“党的领导”与“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最后吴对大家说：“所谈的东西，请大家不要书面发表，但可以口头传达”。并在上午带了他儿子吴宗素（在厦门任教）来笔记，说为了让他儿子好去福建向张光旭主教传达。

下午分三小组讨论。

开始时一般对吴的发言表示拥护，上层如谭沃心、丁玉璋特别赞扬吴的“宗教信仰坚定”，熊真沛还肉麻的捧场，部分上层如吴贻芳、涂羽卿、江文汉等则表示吴所说的问题很对，但不够“策略”。涂说吴还应家多着重说些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江认为应该多说些正面，要增加战斗性和号召性。吴贻芳想找吴个别谈话，认为吴说话太主观一些。

中间份子（较好的）今天也迷失方向，不能辨别，都认为吴的讲话有启发。

小组中经进步份子略为启发以后，一般中间份子络续都能对发言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谢永钦说：“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敬，合不起来。”吴高梓说：“谈形势只有从政治客观情况谈，用宗教不能解决政治形势，吴先生提到今后方针任务，我党得我们接受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在方针任务中突出来”。左弗如说：“吴先生从头到了缺少一个主题，就是去年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今天一个报告好像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一样……结果引用了两句圣经，并不解决问题”。程步云说：“负责人也这样看法，方针任务58年以前那年都能用，他是否可把政治和宗教分开，至少在这次会中成绩要归纳肯定，一年来主要成绩在那里，存在什么门题，今后道路怎么走法；至于信仰上教会有无前途等我们也早都解决了”。总的大家认为发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晚上举行扩大会务会议，汇报小组情况，提出各租意见。吴有些紧张，连说：“我本来是说所讲的只是书生之见，狂妄之言，欢迎大家意见，现在这方面很成功”。但又赶忙解释说：“因为不是做总结，所以没有把一些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放进去”。

吴贻芳拼命代吴声辩，在会上表现出对所提意见十分不满，但会后又赶忙找丁光训表态，说吴耀宗太主观，又觉得自己太脱离实际等等。

谢永钦对提出意见的确有感受，连声说吴的发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会外情况

曾友三告诉丁光训：陈见真曾问曾，“河南基督教教牧人员都去搞生产，你心里平安吗？”

丁光训问曾友三：“河南省教牧人员在学习中对教牧人员阶级属性问题有没有多谈？”曾说：“没有，我们那边很好，没有人说我们是剥削阶级，干部和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时常说，‘我们大家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看来曾对阶级属性问题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刘清芬在下午小组会后说：“本来有些脑筋糊涂，经过讨论，思想明确起来了”。以后又说：“那些老牧师还是很满意，年青人不一样”。

陈建勋（在大家讨论对吴的意见，他替吴辩解）说：“宗教水平不是宗教立场，是宗教角度，即教牧人员要用宗教语言，免得信徒认为专门讲政治”。

郑锡爵（大家谈论后，又到陈中浩房间来）说：“那些老牧师还是很满意，吴先生的话，还有它的另一面，应该注意”。

晚饭后谭沃心对孙务纯说：“吴的报告不可能十全十美，当然像十个指头有长短，但吴一开始已声明，所以大家那么样挑剔求全，是对吴不公平”。后来又说：“当然大家如此讨论还是好的，胜过像人代会听首长讲话后，大家都说一样的几句话，现在大家提不同的意见可使讨论更深入”。对于大家提吴没把党的领导放入方针任务中去一事，谭说：“党的领导很重要，吴没放进去，显然不是忽略，而是有其理由”。“我们究竟是宗教团体，要做好工作，当然应有党的领导，但应贵乎有那精神，而不在乎有那几个字眼”。

附件：吴耀宗在1959年8月31日上午发言记录

过去两个星期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我今天不是做总结，是个人发言，一部分是从大家意见综合起来的，另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意见，其中可能是书生之言，也有狂妾之见，到底有多少正确？不知道，让大家讨论，既然不是总结，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首先说两个问题：

1.形势：大家对形势谈了很多，里面有许多问题，大家谈东风、西风等问题，我今天不谈这些具体问题。我们重视形势，因它与我们工作有关系，我想到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形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辩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辩这时候的神迹。”目前形势从许多迹象来看，看不清形势 就会产生悲剧，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样，上帝是用形势来审判人。形势大家谈了许多，东风压到西风，“敌八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句话用宗教言语说是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受上帝的审判，这种制度是魔鬼制度，这制度一定要死亡，上帝正兴起另一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它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以宗教语言表达刚才的两句话。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在所谓无神论的国家，我加所谓也许有人不同意，因为我们判断是非时是否以信与不信作界线？这不应该，我又想起马太第8章“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句话我不必把含意解释，大家会用自己的话解释。

上面我拿几个粗线条把目前形势描绘出来，如不抓住形势，我们会悲观，每逢风吹草动，就会站不稳，这个总形势是迂回曲折的，不是直线发展的，也不是完全符合主观了愿望，有人说帝国主义这样坏，为什么不马上被打倒？我又想到马太13章恐怕蓐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蓐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它是有自然发展规律，形势发展是迂回曲折的，不要因为这样就迷失了方间，中国解放，三大敌人的被打倒，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什么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如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中国的演变是必然发生的事。

上面所讲不但把形势提高到政治水平，也提高到信仰水平，你把它提高了，就不需要把爱国爱教、爱国反帝给合起来，这几件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个总体，是一件东西的几个方面，从信仰说都是在上帝的安排下。如从上面观点了解，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问题掌握可以得出下面结论说：教会不是与人民对立，而是与人民在一起，广大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请大家体会这两个“人”字，这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广大集体的人，从基督教信仰角度说，离开人和人的需要谈教会工作，是建立在沙上的，离开人和人的需要谈灵性生活，灵性生活是空虚的，是有害的。这是形势与工作的关系。

2.历史：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必然会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基督教信仰也不会例外，拿四个福音来说，由于写书人的思想背景不同，写法就不同，重点也不同，上帝是一个，但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看法，同一时代，环境看法也有不同，如看一个山，晴天阴天不同，近视的，色盲的不同，地质学家与艺术家的看法也不同，还有是真、假的问题。拿宗教来说，天主教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大家公认，基督教为什么进行三自，割断帝国主义关系，控诉传教士呢？是因为生长在中国的基督教已完全成为麻痹人民及对外侵略的工具，我们打开美国很有名“基督教世纪”，我总是深深地叹一口气，因这个刊物的看法五角大楼、杜勒斯看法完全一样，杜勒斯死了，“基督教世纪”还做了评论，夸他是虔诚的信徒。既然西方基督数是这样的基督教，我们对传教士就只能有一种估价，不管他们自己的看法如何，其中有什么程度的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由于他们的社会性质及所受到的影响，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西方基督教既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基督教就负有庄严的历史任务。既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在上帝审判之下，既然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的要求，是上帝旨意，中国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传来的基督教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不但要破还要立，“破”什么大家清楚了，立什么大家过去两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已认识了的，使教会更能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有人因破而悲伤，甚至发出教会有无任何前途的疑问，有人因立而\*\*，有人对新的东西是否考虑太多了，不够重视教会及信徒需要？在这历史转折点中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看得大，看得深，否则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我们也要重视每件具体工作，使它尽善尽美，否则会成为教务主义、冒进主义的错误。

什么是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任务呢？就是大胆抛弃不符合新时代的旧传统，大胆表达我们在新时代看见的亮光，从而更有力的阐扬基督教福音的积极性，更好地在新时代为福音作见证。这是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任务，我们处于历史转折点，某些方面处于青黄不接，这时期破的不彻底，立的刚开始，如我们的事业——神学、出版几乎完全停顿，在这转折点中，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抱杞人忧天呢？不应当，让我们抱充分信心，相信我们将来有新的，合而为一的教会，我们的事业会有新面貌，将来要有新的神学系统。在清除帝国主义烂摊子后，一定能建立独立自主，荣神益人的新教会，为什么说是中国来基督教的任务，不说世界的呢？这不是我们有什么才能，过高的高抬自己，而是中国教会的历史情况和中国信徒的深刻经验，如我们教会是西差会传来的半殖民地教会，中国人民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有着辉煌的成就。中国信徒在这三种情况中得到新的亮光，资本主义国家基督徒不可能有这种经验，民族独立国家基督徒也不可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督徒经验也不尽相同。最近有兄弟国家基督徒发生忏悔日，我们不同意，美帝丢了原子弹为什么要我们忏悔？让我们在上帝引领下贡献最大的力量。

3.怎样解决我们的问题？这部分包含很多问题，在上面总的认识下，我们如何解决问题。

（一）教会仪式：制度及活动问题，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列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

（1）各地仪式、制度、活动不同，我们不要求其统一，也不可能统一，我们只能按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如做礼拜，一年四次，一年一次等。

（2）我们要批判旧传统，但对有利于教会发展的东西都可保留，如堂董会、发扬信徒民主，但不是原封不动，堂董会应给予新的内容。

（3）考虑问题时，不能单从教会需要出发，也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原则，但可灵活应用，不要作为教条，不然有偏左偏右的危险。我想我们每个人回去都可以检查自己的工作，从下面两方面检查：第一，看我们在大跃进中是否太右了；另方面也问我们工作是否满足了信徒的需要，特别是灵性的需要，是否发挥了积极性，对同工安排是否恰当？做到人尽其能，心情舒畅，有没过“左”，这检查是否需要？在看到公社整社后，纠正了错误，难道我们在新的工作中就不会有缺点吗？检查对工作是有好处的。

（二）关于宗派问题，有的地方取消了，有的未决定，但宗派已经不存在了，还有的作为保留，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差会强加在信徒头上的，是帝国土义进行侵略分而治之的政策，没有保留的必要。多数人肯定宗派将来必定消灭，包括Secte，耶稣家庭在内。从宗教信仰角度看，宗派有没有值得保留的？可能有，但现在为止还未听到那一位同工提出这要保留的，就是有，是否必须保存宗派来保留这些东西也是疑问。还有差会传来内信仰特点，如聚会处、安息日会的特点，我们应如何看？我认为应分别看，从信仰出发，是好的，另一些特点就有问题，如许多与混乱现象、反动活动有关的，都以信仰特点名义出现的。还有信仰互相尊重问题，教会联合后，是否没有了呢？我认为还是互相尊重的，首先联合不是勉强的，在同一宗派基督信仰是否全一样呢？也不尽然，联合后互相尊重的原则没有改变。

（三）劳动生产、自我改造问题：

（1）教会工作人员阶级属性是由于过去历史关系，替帝国主义服务，也拿帝国主义的钱，是剥削阶级，必须进行改造。

（2）怎样改造？大家对参加劳动生产也没意见，我们参加劳动生产，不只是为了改造，也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些贡献。

（3）既要改造，什么时候可以改造好去掉帽子？有人认为去工厂、农场劳动后阶级成份就马上改掉了。改造没有这样简单，但什么时候完成改造？这问题没有清楚界线，也没有人来考试，说你是3分、4分、5分或毕业了，故不能从形式看。什么时候改造好，我认为什么时候感到你与社会主义没有抵触，对资本主义不再有什么留恋，当你已感到你自己站在人民之内，不是站在人民之外，做的是有利于人民及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别人也这样看你。到了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你的改造好了，阶级成份也改了。

（4）阶级属性及传道人身份问题：一个未改造好的传道人，当然属于剥削阶级，已改造好就不能说还是剥削阶级，因为传道人是直接为爱国的信徒服务，间接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如不这样看，则传道人属性与身份永远分不开，传道人不管如可改造成了永远是剥削阶级。这样新中国谁愿作传道人呢？

（5）传道是否可作专业职业？多数人觉得可以，有些同工觉得应该尽量参加劳动生产，大家提传道是否可作专业？並不是都要作专业，而是有人可传道多些或少些，相应的作些劳动，有人可肯定作为副业，虽然如此，但有人按需要把教会工作作为专业，如神学教授，专业传道人也不全部作教会工作，也必须参加义务劳动，但教会工作是主要的，关于传道人是否作专业的问题，我们从宗教政策，政策法令及传道人阶级属性看，我自己得出的结论，並不存在传道人不能作为专业的情况。

4.关于教会前途问题。張光旭主教提教会有没有任何前途？这是一种未发表出来的惶恐，因此我问对这问题要很好分析，我做出以下的初步意见：

（一）在目前形势下教会的方向、方针、任务问题上面谈的都牵涉到了。

（二）教会存亡间题：我分析发生这问题的原因如下：

（1）帝国主义及教会内反动派的宣传；

（2）解放后教会情况，改变多得很，把帝国主义架子摧毁了、有些数会关门了、有些教会活动如福音电台、街头布道也停顿了，也由于清除教会败类，如王明道以前有800、1000人，有人就得这样结论，教会范围越来愈小了；

（3）联合礼拜、人事调整、教牧人員参加劳动，教会事业如神学暂停了，有人看为前途不妙；

（4）由于今天社会主义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也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有不少宣传及批判宗教书刊，使靑年受影响。有人放弃了信仰。大致发生这问题的原因有这四种，既然问题存在，对问題应如何看呢？分析起来有三种态度：

（一）恢复教会过去情况，解放前差会情况，觉从前情况有前途，今天情况没有前途，这种实际是敌人、教会内右派、反动派的态度，有人不是敌人，但亦这样，我与丁主教在星期六接见一个加拿大外宾，他认为我们教会困难重重，有问题，继续存在很有问题，进行了二小时半辩论，无结果而散。

（二）教会本位的态度，是一个善心爱教的态度，什么叫教会本位？不管国家人民怎样，都以教会第一，不从爱国爱教一致性出发，而把教会与人民对立，不要教会服从人民需要，反而认为教会发展是钱多、人多、活动多，不管对教会有没有好处，以为教会兴旺，发展就有前途，我们说这是不现实，这是不能发展的，如可以也没有前途的，走回头路不可能，就是善人也不可能。

（三）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从教会处境看问题，今天教会处什么环境？应认识今天教会要变，从帝国主义控制下到独立自主的教会，当然包含一系列的变动，破变就是破，就有前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帝国主义的教会到独立自主的教会，需要我们有许多改变，变就有前途，不变就没有前途。从信仰本身看，也包含三点内容：（1）要问一问信仰是否兑现？信的上帝，基督教及它的福音是真的？假的？真理？幻想？你能答复，前途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答是真的，教会有前途，假的会消灭，真的不会消灭。（2）还要看信的人是否真信，如教友是真信仰教会就有前途，不是，没有前途。什么叫不是真信？这几年有披羊皮的狼，搞反动活动，还有人信仰没根基，是落在石头上的种子，他们被清除，放弃信仰是好的，故教会有无前途决定是真信？假信？（3）信的人能否为福音作见证？能，有前途。这些问题不是什么人代替决定，基本上看自己怎样，教会前途从信仰看是自己问题，不是敌人说什么受威胁了。

下面我讲讲个人对教会前途的看法，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不发生教会前途问题，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自己40多年宗教经验证明自己信的是真的，下面我不花时间去说明了，我认为信的是真的，对个人，对社会有意义，我认为福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祂的信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信息，信息是什么，今天也不谈了，这是很有意思的，有时间可以讨论。

最

变的问题，应如何变？有人觉得最好一成不变，变就有问题。基督教历史变动很大，时代是变，教会可以不变吗？没有，甚至神学思想也变，但上帝是永恒的，福音真理是不变的。如果教会代表永恒真理，教会形式会改，但教会前途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附带讲讲我对马列主义的看法，不成熟，供参考。帝国主义看马列主义对基督教是威胁，到底如何？先问马列主义是什么？我对马列主义没有研究，但从实际方面答复这问题，什么是实际方面？就是中国得解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是党的领导，是依靠马列主义为指导，今天我们享受新中国的幸福，饮水思源，你能说是威胁吗？中国解放不符合督教教义吗？总路线靠党的领导，我们拥护社会主义能说是威胁吗？从实际角度说马列主义是基督徒应该欢迎的理论，但有人问马列主义无神论如何？是否威胁呢？这问题很复杂，牵涉哲学，我不谈，我自己是有特殊看法，无神论肯定不是威胁，因马列主义、无神论者迫使我们说出上帝的所以然，在美国没有这样，基督徒觉很体面，今天虽无人问，但迫使我们检查自己的思想，也迫使基督徒在生活、实际行动证明信仰上帝的意义。如能这样，对生活更有意义，对社会更有贡献，就证明信的是对的，我看无神论不是威胁，相反的是良师益友，只有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人民勾当的人，才会觉得马列主义对他们的信仰威胁。再谈下去马列主义目的是改造世界，为人民谋幸福，是否对基督教威胁？我想用任何逻辑也得不着这个结论，相反以宗教为名，美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教会成为麻醉品，掩护侵略，把教会作装饰品，假冒为善才真对教会威胁。近来我看一些美国基督教刊物，说美国教会又兴旺了，为什么兴旺？在兴旺背后有悲惨的图画，那就是失业威胁，生活枯干，流行性的精神病，社会漆黑一团，就成群地到教会去找安慰，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这些安慰无非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就破灭了。我们中国不需要，也不会有这种兴旺，真的基督教威胁是成为麻醉品，没有内容，这才是真的威胁。

5.下面一个问题是中国基督教的国际活动问题。前几年当我们开始接待西方人来访问时，有人问过去割断帝国主义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为什么今天又发生关系呢？也参加他们的会议，接待他们访问？为什么？我简单谈谈，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和平共处的要求，要争取可以争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更多人了解我们，为和平而共同努力，发生关系就是这目的。对于不怀好意的是否拒绝？我约请英国莱士德来访，有人发出疑问，我说对这些人也要给接受教育的机会，接受多少在于他们，这解释好像是矛盾，又要回到国内外形势，今天已更有利于和平，新中国基础更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关系可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因此中国基督教国际关系同样可采取更灵活的做法。我们晓得这里面不是没有问题，是否等于走老路？的确有同工问道有这错觉，是否又可以与帝国主义传教士重温旧好？重新影响我们，灌输帝国主义毒素？我们没这意思，应继续揭发帝国主义阴谋，帝国主义今天更聪明了。帝国主义过去污蔑我们，还采取别的方法向我们进攻，如企图恢复个人关系，甚至用金钱、书刊，又引诱我们参加国际性会议，去的时候他们采取亲密态度，像上次丁主教去开会，他不给你报告新中国情况，反而给从印度来中国三周的人做报告，挑拨中苏关系，有时还夸奖你几句，像何明华他说三自适合时代需要，总目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制造裂缝，说中国比苏联好。因此，我们中国基督教国际活动不是走老路，与帝国主义重温旧好，正面目的是为世界和平，和平共处的要求，因阵营强大，新中国稳固，可邀请他们来访，包括心怀恶意的人，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请，我们不该不发生任何国际关系，另方面我们也不肯说把门完全敞开，我们要发生怎么样的国际关系，那要看每一具体情况决定，看看每一件事以后对自己有没好处，对世界和平有没好处？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既不关门又不敞开而是灵活掌据，还有许多话讲，如我一人讲完没意思，留给大家讲。

又神学、出版问题未谈，神学、出版、三自让大家谈。

6.今后方针任务。为什么要提这问题？我自己也提先看树木，再看森林，这个方针任务是凭主观提出的呢？是根据两周提出许多问题，能否以一句话表达出来，作为大家讨论出发点——贯彻基督教合而为一的教训，办好中国信徒的三自教会；加强自我改造；继续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阴谋；与全国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为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积极努力。如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什么“总路线”，大家可考虑“总路线”这句话如何提出。

这是大家意见，综合起来，我自己意见问题更大，有书生之见，有狂妄之言，诸位不必书面发表，但可口头传达。

1959年9月3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二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9月1日）上下午都是大组讨论，就吴耀宗发言谈“方针任务”问题，特别就“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正确估价”，“能否从信仰出发来解决政治问题（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问题），”“举信仰旗帜还是举社会主义旗帜”，“基督教内两条道路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经过我们昨晚分别酝酿后，中左、中中份子都发了言，一般谈得都很中肯，问题提得也很正确，少数的人提得比较尖锐，上层中除了谢永钦正面表示这样说法非常解决问题发了言，熊真沛发言表现两面讨好，实际替吴开脱也发了言外，其余都沉默不言，陈见真、丁玉璋还表现一定紧张。有些上层在会外竭力设法为吴开脱（如谭沃心、丁玉璋、吴贻芳等）。

武汉陈建勋是唯一的在会上为吴的发言辩护，引起群众很大不满，后半段还做了吴的替身（左弗如等谈话时矛头转向陈）。

部分进步份子也针对几个原则问题作了阐述。

上海一些两面派如戚庆才等因为在小组中为吴的发言大捧场，突然看风向转变，措手不及，感到侷促不安。

一般群众反映这两天讨论澄清了不少思想上的混乱。

吴耀宗在中午饭前召集扩大会务会议，要求选出少数人重新拟一个“方针任务”企图藉此草草收场，后因大家不赞同这次座谈会要搞成文决议而未果。

下午吴又发了一次言（另附记录全文）为自己为什么发言辩护，还对某些发言予以反驳。他说他自己多谈信仰问题是因为过去一、二年来是运动，大家强调政治，有些人心中有问题，不敢讲，因为风往着一边吹。他接着又说，单讲立场与政治问题不能解决宗教与教会前途问题。

吴还俨然以世界基督教领袖自居，说他是从全世界基督教考虑问题。

会外反映

吴贻芳（上午有人对吴发言提出意见后吴贻芳有些紧张）休息时对施如璋说：“这样谈下去解决得了什么问题？大家对方针任务虽然也提了一点具体意见，但是不多，是否还要这样谈下去”？（希望草率收兵）

中午与丁光训谈话时说“谈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把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放到方针任务中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看起来不很好。”下午又对丁表示要想回去，显然看见会的风头转向，兴趣减低。

涂羽卿（会上闭口不言）会外对李寿葆说：“我觉得吴先生所谈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不解决问题，说宗教活动因时、因地制宜，如何安排，要谈得具体些，不然不解决问题。至于那些大的原则问题，像小组向吴先生发言的意见，我看大多数人都知道，你要谈怎样谈，只有吴先生有不同看法，怎样谈”。（意思谈起来很尴尬，不愿得罪吴）

休息时又对施如璋说：“这次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当初开会时大家说好了对过去一、二年的成就应该予以肯定，这次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谈一些具体问题，因此过去我们在两个星期内没有谈成就，只谈具体问题，但是吴的一篇发言却是完全没有想到这样说法是会引起混乱。因此今天有必要在这一个新的基础上澄清一下思想，以后再谈具体问题。”

丁玉璋与韩文藻谈总的态度是同情吴，为吴找理由开脱责任，说：“可能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韩提出为什么相同的地方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见？丁又说：“可能吴先生对各地的社会主义教育情况不够了解，对各地同工的收获不够了解，各地在汇报情况时没有将这一点收获（指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突出，这可能也与吴先生讲话有关系。”最后又说：“吴先生虽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总会考虑到社会主义利益的？”。丁对一般人表示：“这些是根本性问题谈谈很重要”。丁原来曾提出要在星期四回南京，今天下午会后表现得愉快些，向韩表示谈得好，他愿意设法留下。

熊真沛（一面同情吴，一面又觉得众怒难犯，一面想为吴开脱，一面又想说讨好大家的话）对孙务纯说：“这是大家误解了吴先生的话”。“吴先生说话有语病，不周全”。“有时是会上没讲，事实存在，天津联合礼拜以后就有许多人不满意，因此宗教事务局负责同志才会对大家说‘你们宗教的存在可能比共产党的存在还要长些’”。“吴所提的方针任务基本是好的，大家觉得有问题谈谈也可以”。“想不到大家对吴的讲话如此认真”。“吴可能受了张光旭主数的影响”。“吴可能有些脱离实际”。

广州谭沃心对孙务纯表示对大家驳吴的发言不满，说他并没有觉得吴把宗教放在人民之上，特别表示对郑建业的说法有反感，认为枝枝节节，说：“他（指郑）自己也没有提出建议，他提的三点建议在56年也可以用”。

河南曾友三（在吴下午发言后对人谈话）说：“吴耀宗越谈越糟糕，完全看得出有股情绪”。后来又对别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摔筋斗的人不少”。

上海张伯怀说：“吴耀宗还是基督徒立场”。

天津刘清芬说：“吴把57年没说完的东西又端了出来”。“这样倾向发展下去很危险”。“吴连上海方面也没有深入”。

许士琦透露福建郑锡爵昨天挑他说：“你们老牧师对教会前途要说话呀”。许接着说：“他今天在组上又搬出进步的一套来”。

西安王道生在第一次听了吴的发言后在小组中说：“贯彻宗教政策要政府干部由上而下把政策弄弄清楚，西安搞真耶稣会时，干部（党支书）不了解政策，不敢过问怕违反政策。有的地方干部说宗教是迷信，故意在星期日安排教徒工作，不让你痛快过宗教生活……”。

9月1日上午休息时对钮志芳说：“吴把57年来的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所得的成就没有提，吴谈问题是从信仰上来看，但吴所说的确也是事实，例如神学院问题，乡下教会的问题”。接着又说：“讲话要全面不容易，现在许多人就怕写文章”。9月1日下午说：“吴下午发言与昨天所说的没有两样，主要问题没讲，说些不主要问题，我过去认为吴讲话总不会错，所以不能个人崇拜”。

9月1日晨8时丁玉璋和韩文藻谈：“吴先生昨天下午不该谈，给人家一种……（这时做手势，用左手有力地压下，意思是压力）他还是应在最后讲几句，解释几句也好”（讲时皱眉有惋惜感）。

“吴先生可能是没有考虑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句话，但沈德溶的发言说明又可能不是这样。一个人说来奇怪，我们跟着形势走，改变这样那样，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改变，但当一个运动开始后，你若不跟上去，就不行”。

丁今晨（9月1日）与吴耀宗谈早回南京问题，吴同意丁星期五回去，并说会议可能星期五结束，可能星期六结束。

9月2日上午谢永钦在休息时说：“我看吴先生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都投入了，但他没有投入。他好像只站在游泳池边上看看，而没有跳下去。“这次大家所谈的不知他能不能理解，希望他能够好好听听大家的意见，真正得到些帮助”。

9月2日上午休息时，谭沃心、熊真沛说：“党的领导，大家都拥护，今天又没有人要反对党的领导，何必如此一提再提”。

9月1日下午丁玉璋与韩文藻谈话，丁玉璋态度有转变，主动对韩文藻说：“现在的讨论很重要，我可以推迟到星期五走（后同意写信给南京，请人代替主礼圣餐礼拜，能回去则回，不能回则留），讨论的问题很根本，上午大家的发言都很好（谢永钦插话说除了一位以外，陈建勋），就说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吧，也需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丁对从信仰谈形势也感不妥，他说：“帝国主义也可以从信仰谈他的一套，从前美国有原子弹时，就有人说，幸而上帝把原子弹交给美国的手里，没有交给苏联”。

附附件两：（1）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反映；（2）吴耀宗在9月1日下午发言记录。

**附件（1）：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反映**

陈建勋（武汉三自会负责人）：“58年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同时也由于大跃进带来一时物资紧张情况，思想就不明确，1958年大跃进成绩有多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多少……但粮食、副食品、原料紧张，这情况不明了，究竟大跃进成就有多大？”

“去年大办铁，要了很多劳动力……挤掉副食品，有人是有意见，但去年钢铁成绩，在经济方面讲也了不得……”。

“人民公社当时有共产主义风，在农村引起混乱现象，党提出整社”。“在群众中对副食品、供应没有多大问题，但对菜市场和副食品商店的服务员的态度有很多意见，对粮食不足有点意见，却也不大……”。

“我在美国读书时，一个教授说俄国人政府把国内的小麦都运到国外，使俄国人民饿死的不少，我知那是帝国主义造谣。但今天知道我们是有物资出口，照熊（真沛）牧师说的出口倒也不少。一次我去买燻鱼，买不到，听人说燻鱼都出口了。出口当然是有的，亦有需要，但有些信徒不认识，作为教牧人员如何把问题向信徒进清楚”。

蔡文浩（中华基督教会干事、浙江三自会主席）：“去年7000亿斤现变为5000亿斤，去年的数字已宣布出去了，国际也知道了，统计局为什么这样公布？心里不舒服。有人过去不信高产田，我还拼命和他辩……”“这数字相差这许多，如仅是几百亿斤就好些，纠正后……解决了粮金紧张、副食品问题，有人说因敞开肚皮吃饭弄紧张了，有人说再吃也不应这样紧张的，甚至想是出口太多，有各种猜测”。

“过去粮食及副食品稍有不足或紧张时，许多人就埋怨是公社制度不优越，甚至有人提出要恢复高级社，这次调整指标关于粮食部分只是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增产10％左右，是否易使人觉得这是从大集体所有制恢复到小集体所有制，即是恢复到高级社那里去了，过去许多人批评人民公社分配不好，现在用工分制是与高级社时一样”。

“工农业去年一开会就加指标，结果完不成，修配厂就把修配旧机床整个架子加入自己的指标内，报上批评这是不落实。土高炉……今年又拆了，有人流眼泪，舍不得，对上面有意见，干劲受挫折，觉上面没原则”。

熊真沛（广东省三自会、广州市三自会主席、循道公会召集人）：“我考虑帝国主义会不会做文章？决议说这是能超额完成的规划，但考虑有些人是否这样看？可能他们认为党夸张，现在粮食紧张你才讲出来，我在广州时对大跃进、副食品听了几次报告，报告后我接触的人还不大相信”。

刘清芬（天津市三自会副主席）：“有人对这公报不高兴，原来是7500亿斤，现在5000亿斤，甚至有人对现在5000亿斤亦会怀疑”。“会不会有人也曾疑钢、煤产量”。

“粮食方面有人说是否都出口了，有人说都给苏联老大哥了”。

“土钢洋钢分开了，特别是那些日夜搞土钢的人会失望，去年炼时经过一番努力，甚至有人得不偿失，现在308万吨土钢不列入国家数字，会觉白搞了一场，会有情绪”。

“今年提过1959年有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口号，如今却不提了，为什么？”

**附件（2）：吴耀宗在9月1日下午发言记录**

大家展开讨论，提出坦白尖锐意见，帮助很大，我表示感谢，大家意见有些超乎我想象，不会预料，我先讲一句，我昨用传达不是叫大家传达我发言，是说同工们可能要传达或写短报导，不是要大家传达。我的发言不是总结，是把大家东西综合加上我自己意见，目的在于大家进一步讨论，发言是我星期六、日一人在家搞的，想请程序委员会做，大家说投信任票，故有漏洞百出，发言当然有许多未提，如是做总结，党领导一套要提，当然不是公式但要提，不接受党的领导，我脑中没这东西，是否挂教会的旗？扯党的旗帜？是否对党不热爱？是否对群众拨冷水？如检查笔记，我开幕时首先提经过一年半社会主义教育就提到，开幕时不好提，影响大家发言，现在又是总结，方针任务不提与发言性质有关，是总结大家的。除了历史、形势是我书生之见，狂妄之言，其他是根据大家的，是否故意不放？是没想到，不是有意识的错，我是否树教会旗？消极悲观？我自己并不觉存在这情况，大家看得清楚，结论不应我放，为什么我多提教会？是否本位？就是两年来经社会主义教育，一年多政治谈得多，教会角度问题好像也可谈，尤其这是座谈会，要百花齐放，过去是运动，强调政治，运动有运动搞法，锋芒吹他不敢提，包括教会前途问题，沈明燧同工提我欣赏，但我不存在，如有人存在是客观存在，有人说少谈不谈，不是现实，座谈会要谈真、深，一切问题可谈出来，我站起来似谈得一边倒，是否拨冷水？是让大家提出问题，回去时心情舒畅。该谈未谈，为什么大胆谈，如总结不敢谈，发言像射箭，这漏洞百出的东西，引起大家辩论，很高兴，内容不必传达，就说吴先生有发言一句就好。

方针任务提党领导很对。有些地方不是我的话，如“靑黄不接”，郑主教觉不得了，这是指神学院暂停，出版暂停，书旧的批判新的未出来，大家还会记得我的乐观论调，我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会有中国神学。

“有利于教会发展的问题，是否我不要有利于人民？我没这含意。赵复三同工提堂董会，我是否要恢复资产阶级堂董会？没有这事。是几个牧师独断独行好？还是发挥民主。不是要北京公理会堂董会保留，还有不同意见，要不要拿宗教语言谈政治的问题，有右派是利用宗教，不能否认像刘良模提赫鲁玛特卡提悔改日。是否有这毛病我就不敢用宗教语言谈政治？我们是基督徒，有信仰，但不能讲宗教语言，基督徒如何做？这样我很惶恐。”

“张主教的话我不欣赏，是贯彻百花齐放，他开门见山，这样可刺激座谈会思想，我不是为自己解决问题，我自己没前途问题，有同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不走没前途。我自己这样讲了不知多少次，但不解决有问题同工的问题。我提四点理由，有三点是社会主义，应问这些人是否认为这些理由，不是提就不对。马列主义他就是存在心中，前途是立场问题，我觉不是，我接触的人立场没问题，但“前途”有问题，我明天就约一位医学生，他两三年有这问题，“少谈，不谈好”，怕对党挑拨，领导同工要大家谈深、真，我看谈透会对少数抱这问题的人有帮助。

“宗教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右派、反动派是这样，我看这问题深入谈还有必要。”

“谈教会前途我顺便谈对马列主义看法，晓得大家不感兴返，但这次会什么都可谈，而这问题与我20年信仰生活有关系，马列主义的无神论与信仰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崇高，而我信的宗教是有神的。今天又发生“信息”问题，过去自传未碰，我也想到这问题，从这问题也想到马列主义，故有个人背景，不是我自己对马列主义还有什么问题，使大家乌黑满天，

这问题在我20年前解决了，只是联想自己的信仰和大家谈谈。

转折点、历史任务，也有个人背景，沈德溶先生可告诉大家，我写在天风有“基督教悲剧”，为这篇文章帝国主义很愤怒，主要说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打成一片，是悲剧，我要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我常看外文刊物，每年与西方人接触及接触外宾，想问题不仅想中国基督教也想到世界基督教的情况，故我说我是书生之见，狂妄之言。因中国基督教负有历史使命，我是基督徒，要关心中国也关心世界基督教，盼世界基督教方向，今后改变到和平方向上，这就负有特殊任务，因有历史背景。

我不是辩护，大家两天来讨论及对我批评，沈明燧同工谈我脱离群众，闭门造车真对，对我帮助很大，我发言在会开到一半多一点才讲，就是这原故，大家发言很好。

1959年9月5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三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9月2日上午大组讨论，发言者7人，仍旧围绕吴耀宗提出的方针任务，谈自己的看法，比较集中谈党的领导与政治挂帅问题。丁光训就政治挂帅与信仰问题发言，实际上批判了吴把政治与信仰合流思想，说明这种“信仰挂帅”的神学路线是“非社会主义”的。反象申述神学不应为政治“服务”，也不应要政治为神学“服务”，提出只有要使旧教会变得合乎社会主义才是正的爱教。丁的谈话，在宗教上也争取了多数群众的同情。

涂羽卿表明了态度，他批评吴耀宗看问题“绝对化，抽象化，简单化，与主观化”，但发言内容却非常抽象空洞。

李寿葆回顾与分析了教会的历史，说明是共产党的领导才给教会方向与前途，从教会过去三次关头（反帝、肃反、社会主义教育）说明党指出了方向，解决了教会的存亡问题。

西安王道生与郑建业也都对吴的说法又提了意见。

丁玉璋实事求是提出宗教生活安排必须服从于6亿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李储文最后再就三自爱国运动发展过程提出接受党的领导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更不可能有前途。

大家要求发言很踊跃，一般反映上午的讨论很能明确问题。

陈见真、吴贻芳未在会上发言。

下午参观闵行上海锅炉厂，晚上集体读报，读这儿天报纸上关于反右倾的主要文件。

会外反映

江文汉说：“吴耀宗看外国的书籍杂志（指西方的）太多了，脑子里充满了他们所提的问题，他这个人就得要像这样的会来帮助他，少数人是无法帮忙的，别入稍有不同的意见，他就马上否定”。

刘良模说：“我真为吴先生担心”。

刘清芬说：“他这样强调有神无神的矛盾，怎能不消极”。

黄培永说：“反动（指吴的发言）简直是反动”。

沈明燧说：“吴耀宗是三脱离，下面脱离群众，上面脱离领导，中间脱离同工”。

吴耀宗昨天晚上（9月1日）表现紧张，只吃半碗稀饭，看戏时也坐立不安，今天只在会外表现轻松，与大家说笑，若无其事，吃饭时问蔡文浩：“你现在是否是少壮派”（大概暗指蔡也批判他的事）。2日下午叫曾浣陵，读报时中间插问：“你晚上几点钟睡觉”？“你同屋（指施如璋、尹襄）几点钟睡觉”？“李储文他们几点钟睡觉”？意欲究一些进步份子的活动。

缪秋笙也未发言，会外也很紧张，对人说睡也睡不着。

1959年9月5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会”情况反映第十四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9月3日上午大组讨论宗教生活与大跃进或生产劳动关系问题，我们布置了一些人就形势与教会本身情况来肯定大跃进；然后谈到以社会主义利益为前提来安非与调整宗教生活。

但群众由于昨天没有把话说完，自发地又把话题转到吴耀宗的发言，刘良模很诚恳地、很深刻地用自己切身经验提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实质与狂妄自大的危险，也从三自爱国运动的经验说党挽救了大家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事实，说明党领导的必要性，最后尖锐地批判了吴“遵义会议”的思想。

吴立即起立驳斥刘是“歪曲”，但他欲盖弥彰，引起群众对吴说刘“歪曲”非常不满。

中间分子发言如刘清芬等都涉及了对吴发言的不满。

最后广州谭沃心表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联合礼拜，也建议吴的方针任务应加入这两项，但是“基本上同意吴的方针任务”，并且突出强调今后教会工作应“因地制宜”，意指广州自有广州的做法，别人管不了。

中午陈见真向吴提议应该找个机会向领导汇报一下会议情况（陈的要求是积极份子布置的）吴立即同意（大概感到会议有些辣手，才想要请领导帮他下台）。召开会务会议，会上吴贻芳、丁玉璋等都认为早应想到这点，吴立即解释（解释内容很不老实），“我十天前做个简单汇报”（实际吴这次会议中从来未提到要汇报过，十天前是去听报告时遇到盛局长时，盛局长问他，吴才简单的说了几句）。还说：“领导上这次非常关心与支持我们的会，并且再三鼓励我们要畅所欲言，要没有顾虑，所以我对把张光旭主教的信提出来，也提出教会前途等问题，因为领导上说过去是运动时期，现在不同，可以畅所欲言，也因此领导决定不参加我们的会（事实上领导上是指不派人参加卢山的会，改在上海后，吴一直强调领导不参加，也不想向领导请示汇报），怕参加了我们会有话不肯讲，李储文提过可以请盛局长在开始时来谈谈解除一下顾虑，如果我了解得对的话，那末现在已过去了，无论如何，我们是要汇报，盛局长也能从客观分析一下情况的”。吴显然企图将自搞一套的作法说成是领导授意的。

会外反映

戚庆才——在刘良模发言后，郑建业问戚庆才。

问：你觉得怎么样？

戚：我觉得刘良模谈的问题很重要，党的领导问题不能不提。

问：你看吴先生怎样想法？

戚：我想现在他应该有点觉悟了。

问：你看他接受吗？

戚：我是说的他应该有些觉悟了。

问：大家提出意见他也应该考虑考虑呀！

戚：是呀！他还要辩，态度是不好，态度是不好。

陈见真——郑建业问陈向盛局长汇报的问题，陈说：“是呀！这次的会我昨天就想到，不能没有一位来结一结，但吴昨天说最后就是让大家来漫谈一下，我真想请李储文来结一结，但看吴的态度，我又不敢提出来”。

郑说：提让李来结不大好。

陈说：就是嘛，现在让他来结要弄得他很不好办，要是汇报了，可以请盛局长最后来讲讲话倒是个办些，总有个人结一结，不然大家回去就是这样没个结果，很不好。后来又谈到吴，他说：“大家不提得尖税不足以帮助他，我听了他的方针任务之后，回家想想也觉得应该提一提党的领导，但那时只是随便想一下，觉得应该提而已。良模提出说，“为什么没有想起呢”？我听了觉得连我都应该再检查一下，想一想，但吴却还不愿接受，这个真不好。”

吴贻芳：9月3日上午休息时，在走廊内对沈德溶说：“吴先生讲刘良模歪曲他的意思，这话讲是不对的，应该讲是他引用错了。过去一年只能说是发展太快，而不能说是做错了。如人民公社发展太快，所以要巩固，这话我也讲过，但我们意思是指整顿为了巩固人民公社，为公社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又说：“吴很主观，人家提意见他不接受”，“吴上次讲要提高到信仰水平来谈问题，这样讲不知事前有否和宗教局谈过？”

谢永钦：9月3日上午讨论时，听谭沃心发言后对沈德溶说：“教会联合，不合一，这很好，这意思很重要”。

王道生：“我们的时候不多了，没功夫再谈各地教会的情况，应该好好谈谈今后怎么工作。吴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他总出国，受帝国主义影响太大，他想在全世界搞基督教”。

涂羽卿：对刘良模发言表示：“现在讲三自运动如何发起的历史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若是从前这样讲就不成”。

江文汉（对吴耀宗发言反映）：“无论如何，用‘遵义会议’来比是很不合适的”。

谭沃心（对刘良模发言）：“刘最后几句话很重呀”！

熊真沛：“嘿！不知他们里面是怎么回事”。

蒋翼振：“复三已讲灯市口教会有50％以上是资产阶级，将来这些人都不要”。

蔡文浩（在刘良模讲完话，吴站起来说话后，休息时）：蔡对刘良模说：“刘良棋的发言很好，把民主个人主义很具体的叙述，从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接着又说刘提到“帝国主义还把我们的名字留下，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对吴发脾气没有表示意见。

刘清芬：回到房间后说：“吴在57年的发言的确起很不好的影响。”这时许士琦插进说：“当时有许多人抬高吴的地位，对政府干部说话（指吴提宗教政策事）”。

吴贻芳与丁光训谈，吴说：“（一）吴耀宗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经过思想改造，自信心太强，Munial Leetez（英国人，最近访问中国）批评他为‘教皇’，John Wood访问吴时吴独自讲了一小时，Wood后来说他听得几乎无法忍耐，在芬兰世界和大一次小型圣餐上吴又是一人独讲，外国人觉得讨厌”。（二）“教会提党的领导总是不妥当，应当成立一个教会联合机构和三自委员会平行，后者专管政治性运动”。（三）“宗教数百年、数千年后一定会消灭，想去问问石西民同志，是否有何原因？不能听其自行消灭，而必须加快速度”。（四）“强绸政治和宗教分开不好，我在解放初期曾如此说过，当时一青年助教批评我钻空子”。（五）“吴耀宗发言前未和宗教事务局谈过，令我非常惊奇，他要搞神学体系去影响世界基督教也太狂妄”。

现在吴贻芳表示和吴耀宗看法有分歧。

1958年9月8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五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9月3日下午大组继续谈“宗教生活安排问题”。邓裕志、戚庆才、程步云等因为以前没有发言，都在这个时候对吴耀宗发言提了意兄。邓、戚主要是表态，并且自己也就对党的领导问题上检讨了一番。韩文藻、沈明燧就南京与广西社会情况与教会情况，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与重要性来说明教会宗教生活安排必须改变的原因。

9月4日上午大组谈“传道人服务与改造问题”。沈德溶仍就宗教生活安排问题作了补充发言，说明要安排并不是宗教信仰不自由，宗教是自由的，但时间上要安排，并且例举有许多安排上矛盾是人为的，如果能以社会主义的利益为前提，问题都可解决，而且信徒对宗教生活也会满意。

接着施如璋、吴高梓、谢永钦、蔡文浩等都就“自我改造”的重要与必要方面发表了意见。

下午大组继续讨论，发言者有陈见真、吴贻芳（都是在吴发言后第一次发表意见）许士琦与赵复三。陈见真用自我检讨（说政治麻痹）方法来分担吴的责任，两面讨好，而且对宗教问题上歪曲为“会间有人提到过泼洗澡水不要把洗澡的孩子也一起泼掉了，我们清除教会中的坏事，不要同时把我们认为宝贝的宗教信仰也泼掉，但现在我觉得，为了六亿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心爱的孩子，我们也应肯牺牲，就是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也应肯为六亿人民的利益而舍弃”（意指可以舍弃宗教来耸人听闻）。

下午四时半起由丁光训谈“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基督教”，外地成员对目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情况很少听到过，觉得印象很深，表示要加强反带爱国工作。晚上有李寿葆谈接待外宾谈话时的几项主要原则。

吴耀宗与三位副主席及秘书长在中午时去文化俱乐部约盛局长汇报情况。吴说他自己“没有把会主持好”，然后为他的长篇发言作了多方的解释，企图说明别人的批评不是他的原意。吴说，他从“教会方面谈得多了，对大跃进注意少了些”，但是他又说会上大家谈得不够“真”，意即支持他的论点的意见可能还没有出来，最后吴请盛局长来座谈会讲话。陈见真接着说吴这次“启发大家不少”，还说吴的讲话“局限于大家当时所谈的”，实际上为吴开脱责任。吴贻芳说他刚来时就问“领导上对这个会有何原则指示”，因此希望盛局长最后能到会讲话。丁玉璋表现比较诚恳，他说：“我这次得到很大启发，体会到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句空话”。

1959年9月9日

【机密】基督教全国三自“小型座谈”情况反映第十六号

上海市人委宗教局编

今天（9月5日）上午八时至十时继续大组讨论“国际工作”。十时去华侨饭店听盛局长讲话，并参加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便宴，饭后外地人员去参观上海三自加工小组，下午及晚上大组谈对这次座谈会及盛局长讲话的体会。会议即告结束。

由于时间局促，主要由外地成员谈体会，一般都反映盛局长对问题谈得全面，解决了思想上还存在的问题，也有人说：“盛局长等于代我们做了一次总结”。

吴耀宗原拟在盛局长讲话后谈自己意见，后因时间来不及，改在下午大组上作了类似检讨的发言，但会中所提出的关于他发言中的具体问题，虽未涉及，只是表示了一下态度，并且依旧搬出宗教旗帜来，以卫道者自居来蒙蔽群众，他说：“大家对我提意见不是小事”，“主要是因为我处理问题表现主观、偏见、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因此产生脱离群众现象”。他觉得对党的领导，自己没有问题，多年来甚至于解放前就接近党，如果有抵触的话，那末除了由于个人主义之外，主要是因为“信仰给我一种东西，这东西不能从别处得到，使我感到优越感……可能这就使我对党还不能一心一德……有隔阂……”。（吴发言记录另附）

下午及晚上大家发言中除了谢永钦曾提及吴的检查外（谢说：“吴先生的检讨给我们帮助，他几十年进步的人，今天还要检查、要改造，像我这样的人更要加速加强自我改造”），别人正面都没有提到，这点似乎很出吴耀宗意外，当时表现得有些懊丧。

天津刘清芬还针对吴强调宗教一点上发表了意见，他说：“对社会主义的积极与消极是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无关”，业举自己经验来驳了一下吴说宗教的独特性问题。刘说：“我过去受宗教的独特性影响很深，那是赵紫宸等人的说法，我自己在解放初期，还写过小册子，当时狂妄无知，政治上极反动，这种说法发展起来很危险”。

武汉陈建勋、广州熊真沛在前几天都曾拥护过吴的发言，今天也在会上表态一番，陈建勋在发言中，透露了深厚的宗教感情，并把会上有人反对吴耀宗用宗教来代替政治的做法，说成他有了新的体会就是“过去认为政治挂帅，宗教放在那里，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不清，这次我明确了政治与宗教要分开，两者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会中的说法并不是如此）。

了玉璋、谢永钦都提到这次对必须要党的领导与政治挂帅问题有了更明确的体会，谈得也都很诚恳。

吴贻芳申叙了她对局长所说“革命越深入，越需要改造”的体会，说：“改造不是为了挽救个人，而是为了更好的贡献社会主义，并把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又诉说一番，要说明改造的重要”。说自己过去：“明明是明哲保身，还说是遮羞”。

晚上谈体会时，除少数进步份子再把问题条理一下，并针对有些混淆不清的问题，又进一步说个清楚（如宗教与政治关系问题；是否要全部抛弃宗教问题『陈见真歪曲说为了社会主义，可以把信仰抛弃掉』，依靠领导与依靠群众问题）。此外，西安王道生、南昌许士琦都谈了体会，谈得比过去发言都来得清楚，也深刻一些，说明的确有些体会。广西沈明燧还对全国三自提了意见，说：“希望全国三自加强争取党的领导，因为各地都以为全国三自的指示与号召，一定都请示过，而照着去做，如果全国三自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会把大家带错了路”。

会外反映

9月3日晚，曾友三对赵复三谈：“这次会不知怎么结束啊！”“这两天陈主教一直没有讲话，不知为什么？毛主教（指毛克忠）也没有讲”。

“在这大会中吴耀宗的表现从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像八中全会公报一发表，他就说有问题，整个思想非常奇怪。吴觉得现在不能自由自在，于是想摆脱党的领导”。

“戚庆才的发言是完全显出是两面不得罪，刘良模发言很好”。

涂羽卿（9月4日对韩文藻说）：“这个会怎么结束，我看要盛局长最后来讲一讲。你要Y.T.（指吴耀宗）讲，讲什么？要讲就要检查，那就不是这个会的目的。他不讲，谁讲？别人讲（指教会内人）更不好，Y.T.现在是进退两难，很尴尬”。

“这个会影响很大”（但涂始终未谈是什么影响）。

“Y.T.有几个缺点：主观，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大家发言中都谈到一个问题，政治立场问题，从我们学习这几年来看，这不是政治立场是什么？Y.T.怎么会接受这一点，昨天良模的发言也厉害了一些，良模也是这么一个脾气，Y.T.吃不消，就有反应。

“Y.T.几个大运动都没有参加，就是控诉运动，也没有好好参加，肃反也没有；反右也没有。我们跟张仕章（青年协会右派份子）辩论，就在要戴帽子的那天，他为张辩护，说他不是政治问题，是作风问题，大家就不满。他忙什么？我们不忙吗？有进步包袱。有一种说法，过去就不成，现在就可以（指三自爱国运动由来的说法），良模所讲的是事实，那时这么说，人家就要说是政府搞的。那时起草革新宣言，反反复复，搞了四、五遍，送去看，改了又改，后来就要我们开门见山，拥护共同纲领，反帝。政府说这个运动以某某人为首，我们也这么说，那是为了有利于运动开展，一个运动总要有个头，但Y.T.就把所有功劳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按：涂也是宣言发起人之一）。

还有一点Y.T.始终不肯放弃……在北京时周总理明明说，你们不要搞这一套，人家看我们有什么资格搞这一套呢（指吴要搞基督教与马列主义），越搞越出毛病……这个会开得有些泄气（但不肯说出为什么泄气）。

熊真沛（9月4日晚与孙务纯谈话）：

熊：“你看他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很落后？”

孙：“没听说，只是前两天讨论吴的发言时有人说广东二老讲话面面俱园”。

熊（很尴尬）：“的确我们对吴的发言，缺乏从政治上来分析，感觉较迟钝，还有今天施如璋的发言也是批评我们，……她说就算信徒有意见，但你是听资产阶级信徒的话就不敢做呢？还是坚持原则去做。这就是指我们广州。我倒觉得她说得对，我们广州就是常考虑有地位的教友的意见，我们找义工，也是找有钱的，这样就使教会联合不了”。

熊真沛与谭沃心商量回广州后，想搞公会机构联合办公，堂会按公会自行联合礼拜（小规模的）。

郑锡爵与谢永钦谈话（9月5日上午）：

谢：“张光旭主教写这么个条子（指给吴的信）你（指郑）应该以此次座谈会的精神开导开导他……张写了这个条子，那知吴耀宗先生的思想也与张一样，跟着张走”。

郑：“不，张写的那些话究竟代表了一部份同工的思想情况”。

蔡文浩对这次会议表示，能够反复的讨论，对今后三自爱国工作的做法较明确，特别是对参加劳动的认识问题，己参加劳动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立场的改造，不是一定要达到自食其力，并表示候钮志芳回杭后，一同到省宗教事务处去汇报这次会的情况（主要为自己没有参加劳动解决问题）。

蔡还表示可惜这次没有机会对史料工作交流一下经验。

西安王道生对钮志芳谈到这次会议的开法时，他表示盛局长的话是这次会议的总结，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又表示，想不到吴先生的发言没有事先征得宗教事务局的同意，得到党的领导，再加上吴先生是全国三自的主席，过去一向又很进步，听讲的不会错，所以我对他的发言，认为很对，经过大家的讨论，才使我把问题弄清楚些（王旨在要解释他在会议上支持吴 发言的原因）。

陈建励在最后一天作了检讨式的发言后，陈中浩等给他一些鼓励，他说：“这次会收获很大，回去要好好传达传达”。在陈上船时，沈德溶问他对吴的检讨的看法，陈说因为在想自己的东西，所以未听仔细。沈把大概告诉他，陈说：“吴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嘛，还是信仰问题”。

刘清芬在星期日在计算那几个人留在这里没有走（按：留了一部份外地进步份子一起谈总结），还问钮志芳那天走？

谭沃心（广州，9月5日晚问孙务纯）：“那个做记录的男子（指陆克明，三自工作人员，谭疑心他是宗教事务局的人）是不是全国三自的职员？……为什么今天早上盛局长的讲话把座谈会讨论的问题都提到了？他怎么了解会议情况那么透彻？熊真沛说：“昨天吴先生和副主席们及李储文牧师去向盛局长做了汇报，谈座谈会情况，他当然就都知道了”。

熊真沛（对孙务纯谈，9月5日晚）：“刚才李储文说的‘三自运动方针任务早已明确，如今提出方针任务就是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样说法和觉得有些问题”。

（一）对于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在常委第四次扩大会决定中提出，全国三自会并没有向各地三自会明确它是今后的方针任务。

（二）这次通知我们参加座谈会时，信里就说是为了交流经验，讨论工作问题，和明确今后方针，则我们各地提出方针任务，问题是合理的，怎可以说就是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沈明燧问熊真沛对沈最后发言时向全国三自提的意见觉得如何？熊说：“提提当然可以，只是吴耀宗先生心里难过一些罢了”。

熊真沛对谭沃心与孙务纯说：“听了丁光训主教关于外宾工作的报告，提及帝国主义利用神学的情况，金陵、燕京神学院秋季又不开学，那么我们广州协和神学院怎么呢？恐怕要重新考虑吧？！”谭没有出声。

**附件：吴耀宗在9月5日下午发言记录**

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对我提出很多意见，这不是小事，这些意见不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到今后工作和三自爱国运动，对我个人来说更是自己应该非常重视的事，大家向我提意见，这次不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大家也对我提过不少小字报，事后进行过检查，本想找同工一起领教，包括盛局长在内，后来事情忙到现在未进行，一年后的今天提意见和以前不同，但发生问题的性质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又作了检查，因时间限制，还来不及消化大家意见，考虑大家意见，对自己思想还未来得及整理，今天的检查可能还有不正确、错误的地方，盼望上海同工和外地同工继续向我提意见。

在会议中，我感到同工都比我进步，思想比我清楚，处理问题比我踏实，我的思想远远落在后面，我一定是有基本问题存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当然当中有思想问题，的确我对某些问题看法与同工不同，以后我再继续思想，与同工交换意见，向大家请教。可是思想问题应该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与阶级立场有关的问题，表现在我处理问题易表现主观、偏面、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这次发言来说，虽不是总结，虽然是为了刺激大家意见，供进一步讨论，但究竟这是一个较重要的发言，尤其是方针任务，自己没有经过好好的考虑，也没有征求同工们的意见，贸贸然提出，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明显表现。这种态度产生的效果是脱离群众，使我从偏见看事情，对问题看不清楚。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不把它打掉，会使得我常常犯错误，不能做好工作。

另外对党的领导问题，接受党的领导，甚至争取党的领导，我自己多少年来似乎没有存在问题，甚至在解放前，觉得也是接近党的，但如有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立场”在我心中起作用，这东西与党代表的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精神就不可能不发生抵触，还有没有与党发生抵触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个地方，这就是宗教信仰，我和大家讲过我有40年的信仰，曾与唯物主义发生矛盾，后来解决了，经过这个时期发生矛盾之后，我觉得宗教信仰给我一种东西，这东西不能从别处得到，既然有这东西，它无形中占据我自己的想法，就发生一种优越感，可能就是使我与党还不能完全一心一德的原因之一，去年这时候我写“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提到现在还不能一心一德，今后在这方面还继续检查，有这思想，不管什么原因，就使我隔阂，不把个人主义去掉，会在当中有障碍，使我不能全心全意，一心一德对待党，这种思想也应当把它改变和纠正。

再谈社会主义大跃进，我当然与大家一样欢欣鼓舞，如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里面作崇，如与党还不一心一德，就不可能说我完全拥护社会主义、没有抵触（如仔细检查可举些例子，今天不必提）。过去一年来国家大跃进，教会也大跃进，教会面貌也大大改变，同工思想认识也大大提高，无论在生产战线上，教会战线上都有很大成绩，每位同工都非常高兴。我检查在大跃进形势中我对同工同道如何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更紧密地与人民站在一起，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尽力考虑较少，考虑教会本身工作，教会发展，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的关系与影响恐怕是考虑更多些，更重要的不是考虑多少，是考虑教会本身工作时忘记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也是今后自己应该检查的，这样就是先后倒置，轻重倒置，结果反而对教会不好。帝国主义现在千方百计利用基督教，利用中国信徒，帝国主义不一定与什么人发生关系。他可以利用“个人主义”，利用我们一切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利的思想倾向。这无形的东西也是被利用的，故反帝，不但反外面的，看得见的帝国主义，我也反对在我里面而看不见的更微妙的资产阶级思想。

从这里我谈到改造，很多同工谈是长期的、艰巨的、反复的，在座每位同工都参加过社会主义教育，都深刻体会改造的重要性、急迫性，我很羡慕许多同工参加劳动生产，他们比我进步，因参加劳动锻炼思想感情有了很大改变，我按我实际情况不可能有锻炼机会，正如同工说劳动是故造的最好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办法。我平常有学习、参观的机会，这也是改造机会，也应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也是自我改造办法，应争取通过可能办法来加速自我改造。

在这次会议中，同工们如此坦白向我提意见，我深深诚恳的感谢，不但表现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也表现弟兄般的爱。这种表现使我对面前工作抱有无限信心，诚恳地希望上海及外地同工帮助，今后不断更坦白，更多地向我提意见，这样做对我改造更有帮动。

今天总路线、大跃进，党号召鼓舞了全国人民，我们是基督徒，首先是中国人民，我们应如何在各自岗位上，与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以最大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全民性活动，从各位汇报及发言中，这就是同工同道们的首要任务。

中国获得解放，大跃进的成就，新中国有着无限光明前途，是党的领导，今后应该更加热爱党，争取党的领导，使工作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同工从许多具体工作中得到的经验。这点更是我今后应加倍努力的地方。十多天以后是三自成立九周年，这个运动有很大成就，丁主教说这运动有世界的影响，如没有党的领导，三自运动不可能产生，不可能有今天成就，“三自”正如同工说是挽救了教会，保证了教会前途，但今后还有艰巨的反帝爱国任务，因此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来负起这个任务。

最后我个人看这次会开得很好，大家能畅所欲言。这个会是大家的会，大家交换了经验，更重要的是纠正了我的看法，通过讨论明确原则性问题，这个会是座谈会，我得到了很大帮助。这个会既不作总结，又不作决议，但大家有没有东西带回去呢？可带回去的是重申了社会主义教育中的结论——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单单重复这句话，这次会中我们用了大量事实，亲身体验，真挚情感，使这句话发出亮光，成为生命。如加一句话就是认识自我改造的重要性，旧的东西对我感染多么深，自己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没有进步，但每一运动，每一具体事情的考验，自己仍是在肮脏的东西中不自觉，这次座谈会使我更认识自我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我自己不应当把自我改造望而生畏、消极，只要有决心，通过服务、工作及实践，一定可以在改造大道上前进。

最后，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加强自我改造，有了这两个东西，就有方向、有武器，可以应付一切问题，做好每个人的工作。

这次我初步检讨，一定有很多问题未谈到，检查不深刻，盼望同工在会中，今后给我提出意见。我感谢同工们给我的帮助。